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素有“淮海东来第一城”之称的古海州,地处“南蔽江淮,北控齐鲁”和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海州古城内外及山川之间,佛道两教历代兴建的寺庙宫观建筑比比皆是,虽代有兴废,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就达六十余处,直到清末民初,仍有“九庵十八庙”之说。这些风格各异、造型精美的寺庙建筑,既反映了佛、道教在海州的兴废交替,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融合的见证,是两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缩影。详见孙大伟先生《海州九庵十八庙探源》。

兰孟者,云台山僧,祖籍山阳,出家云台山后顶北海观音寺。遇裁海之变,庙毁僧散,沦为行脚僧人。僧兰孟于裁海有切肤之痛,见一班书生为恢复云台而奔走呼告,遂主动参与其中,出入于上层达官贵人府第,恳求他们对复海大业的支持。其后复海事成,兰孟功不可没。另据地方古志书载,云台山有“云台山三元宫碑”、“云台山观音殿碑”、“重建海州云台山青峰顶纪碑”三碑,然今云台山仅存“重建海州云台山青峰顶纪碑”,余二碑不知所踪。朝阳张茂田先生的《兰孟与云台山三元宫碑》一文探讨了兰孟与云台山三块碑刻的关系,以期解开这一历史谜团。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与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签订“购岛”合同,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乃至全世界华人的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关于钓鱼岛地望属性的历史审察》一文,是我市地方文史专家,知名学者李洪甫研究员1997年写成的文章。1991年李洪甫赴韩讲学,在汉城接触过一些地理资料,回国后又检索了海峡两岸的相关材料,从边疆考古的视野,完成了此文。该文从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琉球本土人氏和西欧的航海家包括日本政府和海军的官方志书以及学人专家等方面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

抗战期间,八路军115师以平型关大捷而为全国四万万同胞所熟知。时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5团政治部干事的王宏鸣,参加了平型关战斗,之后随115师政委罗荣桓来到山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5月,苏鲁豫支队成立。接着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创立,王宏鸣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兼湖西军政委员会主任,成为湖西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就这样一位党和部队的高级领导干部,到了1941年2月,竟然蜕变为一名汉奸,成为伪71旅李亚藩部营长、团长,并对我滨海根据地进行疯狂的“蚕食”,对我军形成了严重威胁。此人到底是如何从党和部队的高级干部蜕变为可耻的汉奸,他的结局如何?请看王滨同志根据相关史料撰写的《从王宏鸣到杨步仁》。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许多人的终生追求,有的人是青年时期入党,有的人是中年或晚年入党,可你知道吗?在我们连云港市,有位老人八十高龄那年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就是王友芝。王友芝何许人也?他为何在八十高龄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读完《王友芝八十高龄参加共产党》一文,你就知道答案了。

连云港史志

目 录

《连云港史志》编委会

顾 问 (以姓氏笔画排列)

古龙高 江行舟

刘畅征 许燕嫫

杨春生 李洪甫

张学贤 张良群

彭 云 韩世泳

主 任 李 东

副 主 任 张 斌

朱 瑞

陆瑞萍

委 员 (以姓氏笔画排列)

王忠新 王 滨

刘 鹏 邱仕明

何洪斌 姜龙才

郝 芳 董恕志

韩翠林

主 编 李 东

副 主 编 张 斌

朱 瑞

陆瑞萍

责 任 编 辑 邱仕明

张伟敏

文 字 总 校 张俊鹏

■ 卷首语

本期导读…………… 本刊编辑部 1

■ 港城将星

陈建——坦克兵里走出的共和国将军

…………… 本刊编辑部 4

厉新光将军——戎马生涯谱战曲 桃李芬芳耀新光

…………… 王文岩 房永智 7

■ 历史考证

关于钓鱼岛地望属性的历史审察…………… 李洪甫 10

“石花县”探寻…………… 李正耀 13

■ 地方文化研究

先秦时期的连云港沿海部落(下)…………… 毛太銮 16

海州九庵十八庙探源…………… 孙大伟 20

兰孟与云台山三元宫碑…………… 张茂田 22

是“郁洲”不是“郁州”…………… 李思慧 25

■ 历史与发展

“斗战胜佛”品牌打造对于连云港发展的深远意义

…………… 刘成文 27

封面介绍



民国建筑：上海大旅社

上海大旅社位于连云街道胜利路,1933年由上海人马某兴建。建筑面积861平方米,中式起脊屋顶,内有回廊,正门额上装饰有中国传统的“福、禄、寿”三星浮雕以及牡丹等花卉禽兽图案。建筑依山而建,全石结构,整体呈四合院样式。1945年国民党连云港市政府曾驻于此。1949年初,华东军管会曾在此设华东青年干校。解放后一直是连云港市政府第三招待所。该处建筑对研究我市建市史具有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2010年公布为市第四批文保单位。

■党史研究

- 抗战时期赣榆县党组织的发展 祝新华 30
从王宏鸣到杨步仁 王 滨 32

■人物春秋

- 王友芝八十高龄参加共产党 张学贤 35

■往事追忆

-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次捕虫行动 张树庄 37
曾经的“超声波” 王贵林 39

■史海钩沉

- 连云港是日寇犯愁打怵之地 蔡立志 40
清末垣商李昧辛捐资办学 吴成芳 43

■红色纪念地

- 灌云县小伊乡烈士陵园 本刊编辑部 44

■风物览胜

- 奇峰独秀在磨山 刘洪雨 45

■党史博览

-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3-15)··· 本刊编辑部 47

2012年第5期 总第83期

(内部资料 赠阅交流)

纵览历史借古鉴今
展现风貌追溯渊源
立足港城洞开窗口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地址: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69号

邮编:222006

网址:www.lygsz.gov.cn

电子邮箱:Lygshitan@163.com

电话:(0518)85825137 85821368

印刷:连云港市市级机关印刷厂

准印证号:苏新出准印JS-G033号

出版日期:2012年10月

陈建——

坦克兵里走出的共和国将军

本刊编辑部



北京军区副参谋长陈建将军

人物简介

陈建，男，1953年8月出生于连云港市新浦区，1969年毕业于新海中学，1970年9月分配至连云港市广播电台工作，同年12月入伍，1974年4月入党。大学文化程度。历任战士、坦克车长、排长，师教导队教员、副队长，师司令部作训参谋、科长，坦克团长、师参谋长、旅长、师长，集团军副参谋长、副军长，集团军善后办主任，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等职，其间代理过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副主任和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2002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2010年8月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

17岁入军营，立志报国

1970年12月，由新海中学毕业分配到连云港市广播电台刚工作3个月的陈建得知部队来征兵，面对电台优越的工作环境，怀揣多年从军报国梦想的陈建毅然决定参军入伍。

入伍后，陈建成为北京军区某坦克团一名普通坦克二炮手。在平时的训练中，他作风踏实，善于动脑，训练刻苦，连续三年考取了“坦克特级射手”和“一级通信能手”。

1976年4月，陈建提升为排长。1977年2月，师教导队领导在连排长集训时发现他是棵好苗子，便选为教员，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教员。1979年6月，陈建被越级提拔为师教导队副队长（副营职）。

1979年至1981年，陈建对合成坦克连战术演习大胆进行改革，组织合成坦克连为全师示范教学，培养了一大批骨干，被军区评为“特级

教练员”。1982年9月，陈建进入装甲兵指挥学院学习，1984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被评为优秀学员。1985年至1988年初，在担任师作训科长期间，作训科年年荣立三等功，他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

年青的陈建酷爱学习和思考，从探索训法战法，到研究战术战役等，一年有40多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1986年撰写的《全纵深多方位机动战——浅谈21世纪初装甲兵运用的核心理论》一文被总参谋部评为一等奖。

34岁当团长，临危受命

1988年4月，陈建出任某坦克团团长。当时这个团因种种原因部队建设陷入低谷，是集团军后进的两个团队之一。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陈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思索治军良策。他和团党委“一班人”制定了一年打基础、两年求发展、三年跨入先进行列的建设目标，确立了“四治一知”、“四个一”的整治方案。“四治一知”即治团必先治风、治风必先治人、治人必先治心、治心必先知心、知心为了齐心。“四个一”即一身正气、一视同仁、始终如一、一流标准。

为打翻身仗，身为团长的他带领团党委“一班人”处处为全团官兵做榜样：战士们训练和施工，他冲锋在前，浑身是汗，满脸是泥；查铺查哨，晚上12点前很少休息；加班加点分析情况，研究工作，连续搭进去40多个星期日。由于过度劳累，他4次晕倒在训练场。一次，两昼夜没

有合眼的陈建,一头栽在了训练场上的沙坑里。官兵把他抬进办公室,医生赶来为他输液,他醒后给医生规定:“只输液半小时。”一瓶药没输完,他拔掉针头摇晃着又上了训练场。

在他带领下,经过三年不懈努力,该团先后跨入师、集团军、军区先进行列。1991年陈建率团代表北京军区部队参加全军装甲兵训练和技术工作比武考核,获全军第一名。集团军党委专门做出关于学习该团加强部队全面建设的决定,把这个团树为集团军全面建设的样板。北京军区表彰了该团的先进事迹,并给该团记集体三等功一次。该团连续4年被考评为集团军军事训练先进团。陈建任团长6年,个人一次荣立二等功、两次荣立三等功,并被军区表彰为一级训练标兵。

1994年6月,陈建被提升为师参谋长,翌年调任某坦克旅旅长,年底该旅荣立集体三等功。

1996年2月,陈建任某坦克师师长。他抓班子、带部队、搞建设,多次出色完成重大训练、演习等任务。1998年3月至1999年3月,他到国防大学指挥员班培训,使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如虎添翼。

47岁晋将军,再铸辉煌

2000年8月,陈建升任某集团军副军长,之后晋升少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将军。陈将军处处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他常说:“战备训练必须从严,贴近实战,坚持数年,必有成效”、“从难从严从实战训练部队,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大胆要求,敢于摔打”。他不畏严寒和酷暑,经常深入一线,和官兵一起风餐露宿、摸爬滚打,多次赴内蒙古荒漠戈壁,组织指导集团军所属师旅实兵对抗演练,经受近似实战的检验,把部队锻造成了打赢“铁拳”。

任集团军善后办主任期间,在部队撤编转隶、人员分流、后勤保障、装备移交、遗留问题处理等方面,他做了大量扎实细致有效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善后工作任务。

2007年3月,陈将军出任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其间对装备保障、训练和人才建设、数字化部队试点建设等重大任务完成出色,为部队新装备成建制成系统形成作战能力和保障能力提供了有力指导。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陈建担任北京军区奥运安保领导小组成员,主要负责奥运安保任务部队装备保障工作。他精心筹划,连续几个月加班加点,狠抓工作落实,亲自组织指导北京、天津、秦皇岛赛区奥运安保任务部队防爆安检、应急救援、安全警卫、反恐处突等地面行动,为实现“平安奥运”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2010年9月24日,陈建率部胜利完成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和平使命—2010”上合组织联合反恐军演的各项任务。这次联合反恐军演,是北京军区部队第一次成建制出国参演,是营造有利于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环境的重要军事外交活动。他奉命带领中方战役指挥部先遣组先期到达演习地域后,认真组织筹划准备。身在异国他乡,面对境外生疏环境,在无任何保障前提下,他反复与哈方沟通协调演习训练场地保障和军交运输、营房、生活、医疗等事宜,依托驻外公司解决油料供应,立足自我组织装备技术保障。

中方参演部队装备集中到达哈方车站时,陈将军日夜坚守在站台上组织卸载,连饭都顾不上吃,渴了喝瓶矿泉水,饿了啃口面包。哈军官兵见此,纷纷伸出大拇指赞叹这位中国将军:“嘛啦介次(俄语:真棒!好样的!)!”



2010年9月,陈建将军(右一)率部参加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上合组织“和平使命—2010”演习

此次演习,中方参演部队首次保障境外全程野战化指挥演练,首次组织重装备超窄平板装卸载,首次做到境外演习结束即日组织装返运,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圆满完成了联演任

务,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了荣誉。

42年穿军装,无悔无憾

从士兵到正军职将领,陈建已走过42载军旅历程。从团、旅、师三级军事主官,到进入装甲兵指挥学院、国防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培训,从在军区空军和院校代职,到大军区机关担任领导,他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他钟爱的国防事业。

2010年,陈将军升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后,为建设高素质高效能战区司令机关,为把分布在华北5省(自治区、直辖市)近千个点上的数十个直属师旅团单位建成过硬部队,他提出“讲政治、严治军、打基础、抓落实、保稳定”工作思路,大力加强政治、军事、后勤、装备等建设,确保部队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

他抓部队建设的思路清晰,阐述语言精辟。在团以上党委班子建设上,强调党委领导“要用兄长情带班子,用父爱心带部队,用营家志创基业,用好品行塑形象。”

“骏马吃精料、黄牛吃草料、懒驴吃鞭子。”这是使用干部时他常提到的一句话。让良才受重用,让甘于奉献的不吃亏,对无所作为的批评教育和惩处,使所带部队人才辈出。

抓部队安全稳定,他要求各级“埋怨没有听众,眼泪没有市场,等待没有出路”,“善于吸取别人的教训是明智的,吸取自己的教训是痛苦的,在教训面前麻木不仁是愚蠢的。”他教育各级主官,宁可在较真碰硬、严肃处理中听骂声、得罪人,也不在单位出问题、干部出事后听哭声、当罪人。

身为军区司令部直属党委书记,他紧密结合实际,在司令部扎实开展“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思想作风”教育整顿和“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教育,以及“学研练考评”、“三帮一带”(即帮思想进步、帮技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风)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机关和直属部队建设科学发展,数十项工作受到军委、总部和军区表彰。

陈将军政治上坚定,善于学习和思考,思维敏捷,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他军事素质过硬,精通陆军部队的战技训练和管理工作,遇事

有主见敢作敢为,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艰辛铺就了他前进的征途,困难锻造了他坚强的信念,陈将军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赢得了各级组织的青睐和部队官兵的拥戴。日夜的辛勤耕耘,换来的可能只是国防建设中的一抹绿色,但他觉得值!他对自己的军旅生涯感到无悔无憾。

离乡几十载,情系故里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连云港人,陈建有着浓重的家乡情结。参军离家以后,他一直惦念着家乡。每每从媒体上看到、听到家乡对外开放、经济建设方面的好消息,就非常高兴,衷心希望家乡兴旺发达;每每听到乡音,都感到非常亲切,那根植于游子血脉的符号,始终萦绕在这位将军的心中。

1987年的一个周末,时任某师作训科长的陈建和妻子,在大同市的街道上碰到几个新战士。熟悉的乡音吸引了他们,他俩忙问对方是哪里人,新兵说是江苏的。“江苏哪儿的?”“连云港。”“连云港哪儿的?”“海州的。”“走,到家吃饭去!”说着就拉起这几个战士到家里午餐。此后,他们与这几个战士一直保持着深厚感情。

虽然常年在外,但陈将军对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一直非常关注,他为家乡的发展变化感到骄傲自豪,并经常向战友们宣传,连云港市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期,正在把战略机遇转化为区域优势,大力建设综合性、现代化大型国际港口,大力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大力培育和壮大新医药、硅材料、碳纤维等新兴产业,大力发展花果山风景区、天然海滨旅游度假区等一批有影响的文化项目,坚信必将推动连云港实现新一轮快速发展。并经常向战友们宣传连云港市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成果,对连云港市实现新一轮快速发展始终抱有坚定信心。

一次,在京欢迎连云港市人大代表的聚会上,陈将军谈及市长在政府报告里写到的有关连云港变化,从GDP增长到港口吞吐量跃升,再到财政收入增加,如数家珍般说出一连串数据,让在场的领导都备感钦佩:“陈将军真是很关心家乡,很简单!”

厉新光将军—— 戎马生涯谱战曲 桃李芬芳耀新光

王文岩 房永智



厉新光将军

人物简介

厉新光,1951年11月出生,祖籍山东五莲。1968年于东海县参军入伍至工程兵建筑第一八二团,1971年任团司令部工程股参谋,1976年任工程兵军政干校建筑教研室教员,1985年7月任工程兵学院学术处处长,1992年10月任工程兵指挥学院军事学术研究所所长,1999年6月任学院训练部部长,2004年4月任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同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2008年带队参加汶川抗震救灾行动。2009年晋升专业技术二级。2011年10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签署命令授予二等功。现任工程兵指挥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腔热血赴军营,千锤百炼总成才

1968年的初春,当时年仅17岁的厉新光怀揣报国之志,从东海县参军入伍。他至今仍然记得,在那节驶向部队驻地的军列车厢里,一同前行的东海战友彼此互相鼓励。虽然对未来还一无所知,但厉新光暗暗下定决心,“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干出一番事业!”很快,厉新光加入到工程兵建筑第一八二团成为一名工程兵。工程兵,是我军最“土”的一个兵种,也是最苦最累的一个兵种,不是挖山洞、就是铺路架桥,成天和土打交道。繁重的军事任务没有使厉新光退缩,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干劲:“这点苦受不了,还当什么兵!”凭借一股闯劲,厉新光在部队的工作很快获得领导的认可和群众的肯定,多次获得各级奖励。1971年,是厉新光军旅生涯中重要

的一年。这一年,他凭借三年部队生活中的优异表现,被提拔为团司令部工程股参谋。工作换了,身份变了,但那股干劲依然没变,厉新光还是像当战士一样精力充沛地奔走在第一线。

在新的工作中,厉新光逐渐认识到,随着军事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只有掌握了先进的军事科学知识,才能占领作战和训练的主阵地。于是,在工作之余,当别的战友在消遣娱乐的时候,厉新光总是默默地拿起军事理论书籍,在书桌前一看就是几个钟头。1976年,凭借扎实的学识功底,厉新光被选拔为工程兵军政干校建筑教研室教员,从此走进课堂,步入了培桃育李的金色年华。由于表现出色,厉新光先后任工程兵学院学术处处长和工程兵指挥学院军事学术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带领下,研究所立项上马了一大批重点科研项目,在工程兵前沿军事理论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开拓性研究。由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他被上级任命为工程兵指挥学院训练部部长,2004年4月任工程兵指挥学院院长,同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由一名革命战士成长为桃李天下的将军,由初执教鞭的青年教员成长为工程兵最高军事学府的掌舵人,回顾这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厉新光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是党和人民给予了我一切,我理应为军队事业奋斗终生!”

与时俱进攀高峰,挥汗扬笔写方穹

新世纪以来,世界新军事变革正以风起云涌之势席卷全球,我军各项建设面临着跨越发展的现实问题。工程兵,作为一个具有古老历史的兵种,在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不断演变的过程中怎样才能继续保持勃勃生机,是摆在每一个工程兵人面前的新课题。自上世纪末以来,厉新光将军与一群敢于锐意创新的专家、学者和部队指挥员,站在军队建设的潮头,审时度势地对工程兵作战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认真思考和大胆创新。基于对联合作战的深入研究,他建立了作战工程保障学科,逐渐完善并发展信息化联合作战工程保障理论体系。他对联合作战工程保障力量的运用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主要的联合作战工程保障措施内容和运用时机,确立了联合作战工程保障组织筹划的主要内容。作战工程保障学科的确立,给学院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厉新光将军也先后培养了8名作战工程保障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其中7人已经毕业并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为工程兵创新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厉新光将军在繁重的行政管理和教书育人工作之余,一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战略伪装问题研究》、《登陆作战三军联合破障》、《工程兵抗洪抢险指挥手册》等系列专著,研究的“工程兵作战模拟基础理论创新与应用”课题获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工程兵野战指挥中心指挥系统”课题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构建的“作战工程保障”课程体系获国家精品课程和军队院校优质课程。提起这些成果,任“作战指挥学”、“兵种战术学”这两个军队“2110工程”重点建设学科总负责人的厉将军总是感叹自己工作太忙、时间太少,许多新的军事理论改革思路还没有实践。目前,着眼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的实际需要,厉将军正带领着一批中青年骨干组成的科研团队进行“工程兵综合信息与作战效能验证工程”项目攻关,在工程兵人向着信息化高峰勇敢攀登的征途上,继续挥洒着一个老兵的光荣与梦想。

锐意创新谋发展,心战训练翻新篇

厉新光将军观察问题很细致,在一次毕业

学员综合演练中的一件小事引起了他深深的思索:一名学员在实施直前破障演练课题时,面对强烈的爆炸场面,一拿起爆破筒便吓得浑身发抖,没拉导火索撒腿就往回跑。“平时心理素质都过不了关,战时怎能打胜仗?”拥有几十年部队工作经历的厉将军敏锐地认识到,未来信息化战争对参战军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要求。经过深思熟虑,厉新光在学院明确提出:“把心理学教学作为锤炼学员过硬基础心理品质和强化学员精神支柱的重要途径”。在他的带领下,学院重新修订了教学大纲,把《军人心理学》课程拓展为《心理教育训练和作战》一体化教学体系,实现教学模式的整体转型。同时,由厉新光将军牵头,聘请军内外心理专家成立“基层指挥员心理素质构成研究”课题组,建立起兵种特色鲜明、涵盖基础心理品质、心理带兵能力和心理作战能力三大模块的心理素质能力结构模型,对心理学原有教学内容进行整体优化和扩充。

2004年,在不断奔走呼吁和多方努力下,全军首家集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开发为一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心理训练中心”挂牌成立,厉新光将军兼任中心主任,这标志着我军军事心理教育训练迈上新台阶。这个中心承担解放军总部赋予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培训任务,为部队和院校开展针对性心理训练提供理论支撑;深化各兵种和特种作战人员心理训练研究,为总部完善训练大纲提供决策依据;深化军人心理训练科目内容研究,为部队组织训练提供科学指导;深化心理训练效果评估研究,为检验训练实效提供量化标准;深化心理训练方法和器材研究,为科学施训提供手段支持,促进军队心理教育训练水平整体提高。

这一消息立刻传遍军内外,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军事频道、《解放军报》等国家和军队主要媒体均给予大量报道。中心成立后,厉将军积极带领专家队伍认真探索,研究的“心理教育训练和作战一体化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获得军队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出版了《作战指挥心理学》等一大批专著,填补了军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空白。心理训练中心目前与国家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合作培训学员上

万人次,多次组织心理健康辅导员师资培训班、国家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健康辅导员培训考核,在国家和军队内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困难面前排头兵,为人表率真将军

厉新光将军性格儒雅、谦虚自律,但无论在部队还是在院校,每当组织需要的时候厉将军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其敢打硬仗的军人作风令人印象深刻。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举国悲痛,大批部队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迅速展开救援。面对8级地震后倒塌的瓦砾中血肉模糊的惨状,许多年轻战士出现了心理问题,有的甚至产生了心理障碍。得知这一消息后,厉新光将军立刻



2008年5月,厉新光将军带领汶川抗震军人心理疏导专家组深入汶川抗震一线为广大官兵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

向中央军委发出请战书。很快,由总参谋长签署任命厉新光将军为负责人,筹组“汶川抗震军人心理疏导专家组”,深入汶川抗震一线为参加救援的广大官兵提供心理咨询和疏导。伴随着阵阵余震,厉将军等人来到震区。一边是地震中山区滚石不断,一边是抗震中急需进行心理疏导的青年官兵和人民群众,看到这一切厉将军没有一丝犹豫,直接将队伍带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常常是余震一来大家赶快下车,余震过去再继续前行,车不能通行的地方厉将军就带领大家徒步走到下一个救援点。吃的是馒头夹咸菜,住的是帐篷加凉席。厉将军克服身体的不适,一刻也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步伐,几天时间里转战

都江堰、彭州、绵竹、映秀等重灾区,对震区几十支救灾队伍进行集体心理教育,疏导官兵近千余人。2008年10月8日,全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厉新光和他的战斗团队得到胡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厉将军的带领下,这支光荣的队伍还参加了“4·28”胶济铁路重大事故、新疆“7·5”事件中受伤人员和救援人员的心理恢复,对2008年奥运安保人员和2009年国庆阅兵人员进行了心理调节和疏导,数次以优异的行动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得到了中央军委首长、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2011年10月,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自签署命令给军队建设取得突出成绩和完成任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厉新光将军等5名个人记功,这是对厉将军几十载军旅生涯中无私奉献与努力拼搏的高度肯定!

思念家乡山和水,热爱故土众乡亲

“我是从东海县走出去参军入伍的,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提起故乡,将军总是深情地这样说。每次回到连云港,厉将军都能发现,碧海蓝天里的这块港湾水更清、城更美、民更富。连云港曾是中国八大港口之一,如今在改革开放的汪洋大潮中正激流勇进、焕发出新的活力与风采。2011年,连云港地区生产总值达1411亿元,同比增长13%。连云港历史悠久,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对外与朝、韩、日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而连云港东海县是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西行第一县,闻名中外的“水晶之都”,是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之一,如今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

“家乡美,但最美还是家乡人!”每次遇到家乡人,厉将军总是畅聊家乡变化,表述思乡之情。每次回到家乡,总是发现这里的人们洋溢着积极向上的乐观情怀。每次带兵训练经过家乡,家乡人总是给予方方面面无私的关照和帮助。在家乡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连云港这座古老的城市正不断谱写赶超和跨越的新篇章。提起这一切,厉将军总是高兴地说:“人,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第一资源。家乡人民纯朴、勤劳、善良,我愿和家乡的人民一起,为连云港更加美好的明天继续努力!”

编者按：1991年，作者在汉城讲学，接触过一些地理资料，回国后又检索了海峡两岸的相关材料。值1996年后东亚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作者从边疆考古的视野，写成《关于钓鱼岛、独岛地望属性的历史审察》一文。本刊节选相关钓鱼岛的一节。

关于钓鱼岛地望属性的历史审察

李洪甫

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就钓鱼岛和独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几乎同时地分别向中国和韩国采取了非常的举措——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任意设置灯塔，公开表露占据该岛的欲望。1996年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向日本首相龙太郎提出日本政府应拆除灯塔，桥本以遁辞回避；1996年10月31日，日本外务省召见韩国驻日本使馆政务公使金龙圭，要求韩国停止独岛的靠岸工程。

作为对中韩两国都有过侵略战事的日本，今又用相似的主张和手段干犯中国岛土的主权，此在国际关系史上堪称少见，从地望属性和边界认知的角度对钓鱼岛和独岛进行史实的考订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古代文献对钓鱼岛的历史记录

“钓鱼岛”这个地名在中国文献中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而“尖阁群岛”这个地名，却比“钓鱼岛载入文献晚了345年。最早见于日本明治三十三年(1900)。

明嘉靖十三年(1543)5月8日，明世宗的册封使陈侃从福州梅花所入海，去琉球。据陈侃的《使琉球录》记述，他的使船顺东南航向，经过台湾的鸡笼头(基隆)，先后到达平嘉山、钓鱼屿、黄毛屿、赤屿……，11日到达古米山(即琉球人所谓久米岛)。

陈侃为明朝鄞县人，嘉靖初年进士，做过邢科给事中，为人“讦直”。他的实地记录证力详确。参证《明史·琉球》，中有关于陈侃赴琉球的记载——《明史·世宗纪》的“嘉靖十三年”这一段也明确地写着：“冬十一月庚午祀南郊，是年琉球入贡。”陈侃代表皇帝赴琉球的册封，既有旁证，也有下文。

中国古代文献对钓鱼岛的载述绝非偶有一例。在陈侃写《使琉球录》前后，许多文献中都有关于钓鱼岛的描述：

有一本成于16世纪的“无名氏”著的《顺风相送》的书，细写福州至那霸航线中所见，中有钓鱼岛的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朝廷册封使郭汝霖写有《重编使琉球录》，据该书所载，郭汝霖从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从福州出洋，“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再一日”，到达姑米山(久米岛)；历任明兵部右侍郎、浙江巡抚的抗倭将领胡宗宪编有《筹海图编》，该书在“沿海诸岛”中也明确地载述了鸡笼山、彭加山、钓鱼屿、化瓶山、黄尾山、橄榄山、赤屿……，确认“钓鱼屿”诸岛是中国领土；继郭汝霖之后，明朝又于万历七年(1579)、万历三十四年(1606)、崇祯六年(1633)三次遣使赴琉球，对钓鱼岛皆有记载或转述；万历三十四年(1606)，册封使夏子扬的《使琉球录》曾对钓鱼诸岛东侧的黑水十分关注。认识到那是海沟，称为黑水沟，并用猪、羊进行了沟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清朝廷册封使汪辑赴琉球，据汪辑的《琉球奉使录》，汪辑于6月24日天亮时，见到彭佳山，晚8时经过钓鱼屿，第二天历数黄尾屿赤尾山，汪辑想在钓鱼诸岛的最东侧“中外交界地”赤屿举行祭祀，但时近黄昏，就选择了黄尾屿。汪辑率领军士、在黄尾屿举行了祭祀之后，又焚烧纸船、并鸣钲击鼓。

汪辑在书中明确地指称祭祀处黄尾屿东侧面的赤屿海沟是中外交界地。这是因循中国古代“郊祀”的先例，即祭祀场所选择在出离护城河沟的城郊。赤屿附近有一条深沟，汪辑根据海水颜色的青或黑来分辨海沟，认为海沟就是中外领海的分界线。并对赤屿海沟的深度作出推算，认为

在“千数百”至“二千”尺之间。这是十分醒目地记录:赤屿以西是中国领土。黄尾屿在钓鱼屿东侧30里,赤屿又在黄尾屿东25里。24日下午8时,汪楫的船东行至钓鱼屿,25日才到黄尾屿。参证日本仙台人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钓鱼诸岛的排列,也是花瓶山、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依次向东罗列。毫无疑问,钓鱼屿更是在中国境内(见林子平所绘插图)。这是清政府明确地指认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力证之一。

汪楫为清册封琉球正使,官至福建布政使,为人清正,因“不受餽赠”,受到朝野尊重,国人建“却金亭”以彰显他的人品。人格如此,史德当无大亏,汪楫所载的地望史料,是可靠的。

继汪楫之后,康熙五十八年(1719)，“进士编修”“赐一品服”的徐葆光出使琉球,敕封琉球国王。曾浏览琉球王府的文献收藏,归后,撰写《中山传信录》,历述海上风土。该书的载述受到多方的信赖,不仅被琉球人、地理家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多处引用,而且于日本天保二年(1831)在日本出版,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最主要的知识来源。《中山传信录》对福州以及鸡笼头、花瓶、彭佳、钓鱼岛、赤尾屿东100里的久米岛作出了明确的载述,并指出在赤尾屿东100里的久米岛(又称姑米山,姑来山)才是琉球的西南界,西距钓鱼155里。

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使周煌入琉球,写有《琉球国志略》,确认了汪楫的记录。嘉庆五年(1800),清册封使李鼎元入琉球,过钓鱼屿,在赤屿海沟举行了“过沟祭”。李鼎元在航海长的协助下,仔细地考察了海沟。嘉庆十三年(1808),清册封使齐鲲入琉球,途经赤尾屿,经过海沟时,举行了海祭。归后作《续琉球国志略》。清道光十八年(1838)清册封使五月五日出海,六月未时到钓鱼岛。清同治五年(1866),清册封使赵新赴琉球,写有《续琉球国志略》,记载了六月九日从福州入海,十一日酉时经过钓鱼岛的情状。

……

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献对钓鱼诸岛记录的翔实、执着和再三强调,指认中外分界的明白、确凿和相互映证,使钓鱼岛土的归属本不应该存有争议。

琉球、日本及其他航海人对钓鱼岛的历史认知

早在1650年(清顺治七年),琉球人羽地按司朝秀(即后来任琉球王国执政官的向象贤)就在他写的《琉球国中山世鉴》(见伊波普猷、东恩纳宽、横山茂共编的《琉球史料丛书·五》)中,记录了“钓鱼屿”、赤屿等钓鱼诸岛的岛名。众所周知,向象贤是“琉球国支配层”的“亲日派”“执政官,”他的关于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认知是客观的、历史的。170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被称为琉球“最大儒学者”和“地理学者”的程顺则在其所著的《指南广义·针路条记》及其附图中记录了钓鱼屿的地名。程顺则与1718年入琉球的册封使徐葆光有过学术交往,这些交往体现在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和程顺则的《指南广义》中。徐、程的地理研究都汲取过琉球王府的文献记录,也都受到琉球的大学者蔡温的赞同和影响。据日人东恩纳宽在《琉球史料丛书·五》中介绍,蔡温是号称“琉球王国时代”通晓“地理的最大的专门家”。他曾专攻气象、天文、地理,后来,任琉球王府执政官。对琉球的产业开发和土木工程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关于钓鱼诸岛的认识也绝不可能是轻率而盲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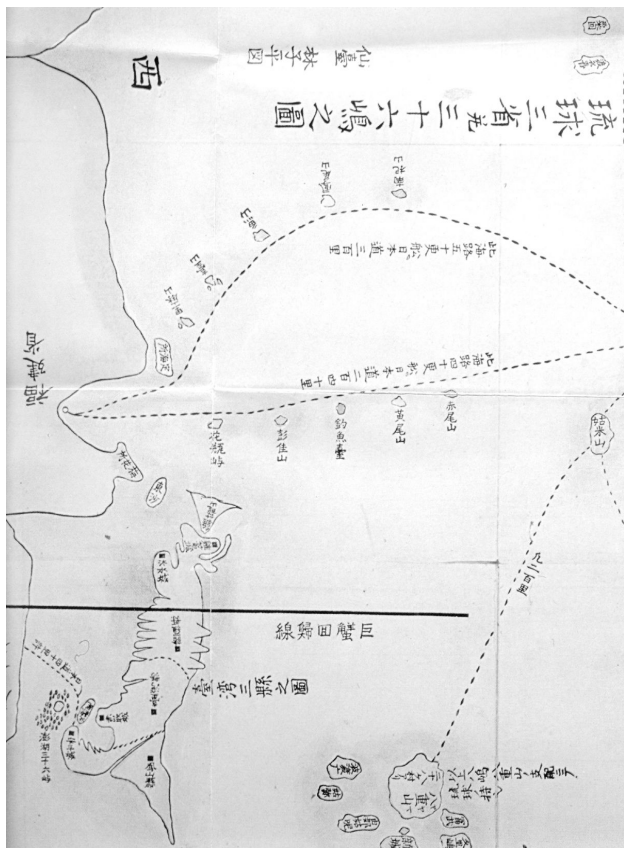
日本天明五年(1785,清乾隆五十年),仙台人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出版,附有彩色地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图的左下角有“天明五年秋,东都,须原屋市兵卫梓”的版号。林子平把并列的花(化)瓶山、彭佳山、钓鱼台、黄尾山、赤尾山皆涂成与中国本土和福建省一样的粉红色。很清楚,作为日本的本土文献、由“仙台林子平”编纂的“三国通览图说”十分明确而醒目地将钓鱼诸岛标识为中国的领土。

林子平标识的岛名与所谓“尖阁列岛”毫不相干,而与嘉靖皇帝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所记的岛名大同小异:

陈侃的《使琉球录》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

鸡笼头	鸡笼山
平嘉山	彭佳山,
钓鱼屿	钓鱼台
黄毛屿	黄尾山
赤 屿	赤尾山

所谓小异,是标示译音时用字的不同,林子平并没有照抄照搬。



1785年,日本仙台林子平所绘钓鱼岛地图

林子平在他的《三国通览图说·序》中说,对于这涉及到数国的地图,“小子不敢杜撰”,也就是说,林子平把钓鱼诸岛标识为中国的领土,并不是轻率的,也不是如一些日本人在评论林子平的《图说》时所指称的;林子平是“原封不动地”、“机械地”、“失误”地“摹画”。地名上的“大同”是林子平对史实的承认,而地名中译意相同而译音用字的差异是林子平站在日本学界立场上的对地名的考订和认识,绝不是什么“原封不动”或“机械地”、“失误”。

在对待台湾岛的主权归属上,林子平的图说甚至反映了日本政府意欲占据台湾的立场。他把台湾岛涂成黄色,就是说明。日本有侵占台湾的企图,由来已久。据《明史·琉球》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日本有取鸡笼山之谋,其地,名台湾,密通福建。尚宁(琉球王)遣使以闻,诏海上警备……”据《清史稿·属国传·琉球》所记,直至清代同治十年(1872),日本一直在实施“籍口称兵台湾”的阴谋。林子平的《图说》,至少

能够说明:天明五年(1785)以前日本一直明确地承认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尖阁列岛的名字,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直到明治十二年(1879),冲绳的县政施行时,日本内务省地理局编纂《大日本府县分割图》,仍然没有尖阁列岛的地名。实际上,正如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在他的由现代评论社于1972年出版的《尖阁列岛》一书中所说,尖阁列岛这个地名,直到明治三十三年,也就是1900年,才由冲绳县师范学校的教谕黑岩恒命名。

冲绳师范学校教谕黑岩恒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写出论文《尖阁列岛探险记事》,发表于1900年8月《地理杂志》的十二辑四十卷至四十一卷,这是尖阁列岛名字首次出笼。就是在这篇《尖阁列岛探险记事》中,黑岩恒依然认知钓鱼岛即钓鱼台的地名,并与林子平的图说对照。

1845年6月,英国军舰“SAMARAC”号曾对钓鱼诸岛之一的黄尾屿登岛测量,据舰长Edward Balcher的航海日记,岛上有中国漂流者的遗骸、居住洞穴、寝床以及残破的木船。可见,在尖阁列岛起名之前55年,已有中国人在钓鱼群岛居住的史实。

明治十九年(1886),三月,日本海军省水路局编纂发行的《寰瀛水路志》刊行。卷一下的第十篇也有关于钓鱼岛的记录。1908年10月改编的《日本水路志》第二卷也有“鱼钓岛”的记录;1919年(大正八年)七月刊行的《日本水路志》以及1914年刊行的《台湾南西诸岛水路志》等也有“钓鱼岛”的记录。出身于琉球那霸的东恩纳宽,是著名的“琉球学大家”,他于1949年五月写成《南岛风土记》,文中也认知了钓鱼岛。

石垣市乡土史家牧野清写有《尖阁列岛小史》,刊于“总理府南方同胞援护会机关志《冲绳》56号,”文中认知了钓鱼诸岛的地名。

可见,除了中国古代文献准确记录钓鱼岛地名并反复强调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以外,琉球本土人氏和西欧的航海家包括日本政府和海军的官方志书以及学人专家都对钓鱼岛的地望属性有充分地认知。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石花县”探寻

李正耀



苏马湾界碑

余已年过古稀，忆起小时候民间传说“石花县”沉没的故事，直到退休后，有时间读读书，无论正史还是方志，尚未发现有此记载。历史上到底有无“石花县”？至今都是一个谜。

《山海经·海内东经·都州》曰：“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所谓郁州山，在海中者也。”《水经注》曰：“胸县东北海中有大州，谓之郁州”。《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酈道元为《水经》所加的注。他所说的胸县，应该是北魏(386-534年)时的行政区划。但据《魏书·地形志·海州》：刘子业置海州，武定七年(549年)改，治龙苴城，领郡六。其中“东海郡：户一千二百四十二，口五千九百四”。领县四：一为赣榆，二为安流，萧衍置都昌县，三为广饶，萧颐置，魏因之，四为下密，萧衍置，魏因之，却没有胸县。而《晋书·地理下·徐州·东海郡》属县有胸。原来，酈道元的《水经注》是采用东晋(317-385年)以前的行政区划。说明胸县在北魏时易名了。因为替前人的《水经》加注，故沿用旧的名称，毕竟西汉时，郁州都是叫胸。有东连岛苏马湾的界碑作证(见上图)，碑文云：东海郡胸与琅琊郡柜为界，因诸山以南属胸，水以北属

柜，西直祝其，胸与柜分高陌为界。东各承无极。碑立于“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四月朔乙卯”，“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证明东西连岛山脊以南为胸。那么，胸之治所在什么地方？留在后文交代。

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介绍东海境内的“朱紫山”云：“在东海县北五十二里，红壁丹崖，自相辉映，远望若朱紫，因名”。《陈志》：朱紫山“高四十丈，周围三百七十步。”《崔志》：“在东海城北，与羊石嘴对。”同时说到另一座山：“勾卢山，一名马鞍山。在胸山县西南一百二里。县在山东……形勾曲，状似马鞍。”《陈志》说马鞍山“在朱紫山东，高一百八十丈，长二里，南北阔三百五十步。”

《辞海》介绍《太平寰宇记》云：“作者杂取山经地志，纂成此书”，说明乐史对于所取资料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校核。更难说实地踏勘了！比如“勾卢山一名马鞍山。在胸山县西南一百二里。县在山东……形勾曲，状似马鞍。”笔者以为，此书关于距离“一百二里”的记载值得商榷，抑或校对出了差错。首先，宋时，表述距离“一百二里”都是“百二里”，明代亦之。今人所说“一百零二里”，宋、明时行文均是“百二里”。写战场杀馘一百五十人，写成“百五十”。均省略“一”。因此，“一百二里”中的“百”或为“至”之误。再说，胸山县西南“一百二里”似无名字叫马鞍山的山。只有沭阳有马陵山，“又名建陵山、张仓山”。“相传宋代山上有清泉寺，清顺治乙未(1655)年进士胡简敬有《游马陵山清泉寺》七律云：半山清旷路盘回，逼汉松青爽霁开。院落天华铺似雪，泉飞石窦吼如雷。幽林虎踞云依岫，

静寺僧闲月上台。此地登临堪寄兴,候行车马莫频催(《海州文献·沐阳八山》第100期)。显然不是此山。所以,胸县西南“一百二里”的“百”或是“至”之误。应当是“一至二里”。因为马鞍山与朱紫山相邻,作者不可能舍近求远,舍弃郁州相邻之山而将相距百里之外的两座毫不相干的山,拉在一起!因此,马鞍山就是朝阳镇境内老百姓俗称的马山。其“形勾曲,状似马鞍。”只有它才是与朱紫山相邻的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小朱山已非《陈志》所说之状况,已经很小了,寸草不生,南侧山岩呈湿润的铁红色,阳光下闪闪发光,朱紫山名缘于此。其山之南为“火心圩”,圩之南偏东,隔着驳盐河,就是马鞍山,若正视“状似马鞍”。山势是两头高,中间凹。山凹间有直通南北的道路。若俯视,其“形勾曲”,山形由西向东,尔后拐向南,与烟墩山相连。在烟墩山之南,即今汉东海孝妇祠。遗憾的是,小朱山很小了,烟墩山基本被夷平了,马鞍山亦危在旦夕!

由于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杂取山经地志”,而原始的“山经地志”因无相关史料,不知何人所著,难以校核。乐史书中,移花接木的如:胸“县有三卢之山”,粗看以为“三卢之山”是一座山的名字,仔细推敲,似指山名含有“卢”字的三座山,即伊卢山、苟卢(马鞍)山(其山之南数里许,有东西向的官路,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座石筑的卢桥,架在往北流淌的卢水之上)乃至琅琊郡的卢石山等,但伊卢山与马鞍山、卢石山,是南辕北辙。其用意也许是说明胸县之广袤。然而,胸县从始至终不辖卢石山,有画蛇添足之虞。

通过以上分析,上文的“百”,乃“至”之误。全文则是“马鞍山。在胸山县西南一至二里,县在山东”。诚如苏马湾的汉朝界碑所述,东西连岛山脊以南是胸县,那么,马鞍山就在胸县境内,其东北一至二里处就是胸县治所。地名就是搭山。搭山前就是民间传说的所谓“石花县”所在地。《顾志》解释搭山曰:“在孝妇祠西北二里,与朱紫山、马鞍山等山相连。东海县治,昔立于此”。

写到此处,不得不说说胸县的“胸”之本意。地名与地貌密不可分。《康熙字典》释“胸”：“车轭也”。而“轭”即牛拉东西时架在其脖子上的短粗曲木。云台山周围的老百姓称“车轭”叫做“索头”。搭山,右与马鞍山相连,左与虎(菩)山相

接,形似“索头”,就是胸,很形象。搭山之阳,即胸县治所。恰在马鞍山之东北。有史料称:“光绪八年(1882),里人张克敏在虎山前凿海塘,至五尺深,见街道,宽丈许,皆条石”是最好的佐证。也就是因为五尺深下发现了街道路石,给后人留下了“沉没”的话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南北朝时期的胸,是个什么情况。

考《宋书·州郡志二·青州刺史》:明帝讳彧孝建二年(454年)为东海太守。公元465年失淮北,于郁州侨立青州。立齐、北海、西海郡。都昌,汉旧县。寄治州下。可知,此时是一州(青州)三郡(齐、北海、西海)一县(都昌)的治所在郁州。其治所未因旧政权的更替而改变,仍治于胸。

考《南齐书·州郡志上·青州》:青州于宋泰始六年(469),始治郁州上,建元(479年)前后,分别为齐郡、北海治,州治如旧。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分居土著,盖无几焉。建元四年(482年)移镇胸山,后复旧、北海郡,建元改宋郁县为汉名都昌也,还有东莞、琅琊二郡,治胸山也。

冀州:宋元嘉九年(432年)分青州治。泰始初二年(465年),遇虏寇。泰始之后,更治立也。(青、冀)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建元初,以东海郡,属冀州。全领一郡。公元479年移治涟口。

南齐先后有(青、冀)二州、(齐郡、北海、东莞、琅琊、东海)五郡、(广饶、赣榆、郁县、都昌)四县,共有州郡县十一个,其治所均在胸。

《南齐书》系梁人萧子显(489-537年)所撰。据《隋书·地理下·东海郡》曰:胸山,旧曰胸。后周(557-580年)改县曰胸山。考《周书》第101页曰:“建德六年(577年)二月丁未,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乃于河阳、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并置总管府”。第121页又曰:“大象元(579)年十一月……江北尽平。”因此,胸起码在公元577年2月以前,因地处江北,依旧是胸。萧子显有生之年,无胸山。隋文帝于晚周时为丞相,由禅让成为皇帝的。因此《隋书》是可以信赖的。后周改胸县为胸山县的时间约在公元577-579年间,县名变动的原因是改朝换代之需要,或因胸县移镇新的县址,四周山势更为高峻,视野更为开阔,故改之。而今《南齐书》将

“胸”搞成了“胸山”。恐是后人所为。会给史学研究带来不少麻烦。

由此可知,南北朝与所谓的“石花县”息息相关。从前文可以得知,在胸设立治所的,从汉到陈,前前后后有胸、沂平(王莽改)、郁县(宋)、都昌,广饶,赣榆等六县;青、冀二州侨置;东海、东莞、琅琊,齐、北海、西海等六郡,置或侨置。州郡县的建(侨)置达十次以上。老百姓称“建置”为“划县”,十次以上取整数:“十划县”,后来就音转或讹成“石花县”了!因此,正史没有“石花县”就不奇怪了。

那么,县沉了又是怎么回事呢?

《南齐书》曰:刘善明(432—480年)泰始初(465年)至五年(469年)前,历北海太守、冀州刺史;而北海、冀州均侨置郁州,又于“元徽二年(474年),出为辅国将军、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四年(476年)八月乙酉为青冀二州刺史,”在此为官长达十余年。善明身为将军,在县治的东南虎(菩)山、北边的搭山、西南向的马山,相互连接的凹陷处,即左右臂的山腰上垒八九尺高的石墙,以之御敌。因“海中易固”故“不峻城雉”,将治所置于四面环山的盆地里。周围是浩瀚的大海,其南即狮子山(汉孝妇祠)。若遇敌情,烟墩山放出信号,进可攻,退可守,可以通过狮子山到达郁州山(云台山)的众多山头,古人选取这个可以指挥若定,挥洒自如的中心位置,作为行政中心,真是聪明绝顶。比如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年)孙恩攻侵郡县,杀内史”,被“刘裕(南朝宋首位帝王)”破于“郁州”就是一例。所以魏世宗说“胸山为戍郁州的根本”,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善明所筑的“高八九尺”的石墙是在今天的南城镇,比如《苍梧片影·云台山胜迹》第92页如是说。只能说是民国初期的作者吴铁秋先生未能搞清楚南齐时侨置青冀二州的胸山县城所在地而已。

有意思的是,搭山的名称,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民间说“搭山”,一般指相邻的两家盖屋,有先后,那后盖的人家,为了节省一道山(墙),征得睦邻的同意,并且分担相应的费用,使用邻居的山头,这种情况就叫“搭山”。而搭山的名称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其与马山、虎山相邻关系。《云台新志·云台山图》则将马山、搭山的位置上

下颠倒了。

考《梁书·卷第三·本纪第三·武帝下》第38页曰:“普通元年(520年)秋七月乙卯,江、淮、海并溢”(《南史·卷七》、《资治通鉴·梁纪五》如之)。《汉书·五行志》第495页曰:“凡物不为灾,不书;书大,言为灾也”说明“江、淮、海并溢”是大灾大难。是海啸摧毁了古胸县城。而普通元年的海啸,正赶上了农历七月天文大潮,民间谚语说秋七月“初三潮,十八水,二十还鬼一鬼”是说潮汐最厉害。还有“海啸、狂风和暴雨”同时发威的“三兄弟”说,其有翻江倒海、摧枯拉朽之势,破坏力巨大,后果不堪设想。普通元年的“江、淮、海并溢”,是导致八九尺高的石城墙倾覆的重要原因。试想一下,刘善明所筑八九尺高的城雉,或类似于中云隔峰山上的田横岗的干打垒,依山腰构筑,抵御人的攀爬、抵挡刀枪剑戟或箭矢的攻击,是可以胜任的。但是对付似万马奔腾的海啸巨浪,则是不堪一击!城雉冲垮后,势如破竹的潮水让城内建筑物毁于一旦,淹没了街道。给予“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离乡背井者之印象是县城沉没了。民国十一二年,沭阳吴铁秋先生的《苍梧片影》也认为“旧县治在搭山下,今已沉入海中”。幸好那时“郡县十无八九”、“虚置”,“分居土著,盖无几焉”,否则,伤亡空前。州郡县治,从此也就迁到了地势相对较高、如今的朝阳镇所在地——新(的胸)县(县址)。其新县名称或源于此时(520年)。而《南齐书》把“胸”县写作“胸山”县名,是早产儿。让人迷惑!

《江南通志》曰:“新县治即新县村也,城址尚存”的表述不够严谨。因为隋、唐前后,此地并无“新县”行政机构设置。尚存的城址,应是臧君相筑的胸山县城。以上论述恰好回答了吴铁秋《苍梧片影》不知新旧县“更迭年份”的时间问题。

终上所述,搭山在南朝梁普通元年(520年)七月乙卯“江、淮、海并溢”前,先后有十余州郡县在此设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这样一个纯粹行政区划上的十余次调整与变动,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而此地与普通元年的自然灾害中消失了。又因为“土著”无几,流浪在外,根本不知道家乡发生的毁灭性灾害,就以为家乡沉了。于是代代相传,就形成了“石花县沉了”,这个经久不衰的民间传说,一直流传至今。

先秦时期的连云港沿海部落(下)

毛太璠

(接上期)

夏商时期经济文化影响沿海部落

早在新石器时期,随着气候变暖湿润,人类活动走向低丘、平原和沿海地带,但随着雨水增多,上游河水暴涨,下游洪水泛滥,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中、东部的地势总的走向是西高东低,河水由西向东流,而东部地区的山东境内大部分地势较高,山东以北是华北平原,以南是淮北平原,黄河水汇集其他上游河流的河水从鲁北、苏北低洼地带南北摆动入海,有的年份从鲁北入海,有的年份从苏北入海;苏北又受淮河影响,成了黄河、淮河两条上游河流的洪水走廊,山东鲁南低山丘陵的河水也先向南后向东从连云港境内入海,连云港地区常年遭受洪涝灾害,居住在平原、沿海一带的氏族部落受到洪水威胁不断迁徙。

《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说明当时大水已经

包围了山岗丘陵,下游的民众非常担忧、恐惧。尧求能够治理洪水的人,各个大臣和四方诸侯都说鲧可以,鲧治水没有成功,到舜时,就把鲧杀掉,众推禹治水,禹巡行治水从冀州开始,依次是兖州、青州、徐州,疏导沅水向东流,流入黄河,经菏泽并汇合汶水东流;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向东流汇合泗水、沂水,再向东流入大海。《史记》记载:“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艺……淮夷蠙珠豸鱼,其筐玄纁。浮于淮、泗,通于河。”是说大海、泰山和淮河之间的徐州:淮河、沂水得到治理,蒙山、羽山一带可以种植。淮水边上夷族居住地产的珠蚌和鱼,以及用圆形竹器盛着的黑细丝绸。这些贡赋运往京城是乘船经过淮水、泗水,再进入黄河的。说明通过对黄河、淮河等河流的综合治理,这一区域的水系得到很大改善,包括东夷在内的黄河流域、淮河流域的农业、养殖业和丝绸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是第一次有历史记载的徐

淮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公元前约 21 世纪—公元前 16 世纪），夏族，是居住在中原西部的古老部落，早先活动在陕晋一带，后到中原地区继又向东发展，势力范围逐步扩大。据有关历史记载，夏启即位后，东方偃族部落的伯益首先起来反对，集结东夷各部落向启进攻，并将启俘获囚禁，启逃出后组织反攻，将伯益捉杀，东夷部落开始衰落。其后，夏朝的奴隶制政权逐渐巩固，势力范围向江淮区域扩展。但夏启以后长达数百年的夏王朝时期对东夷部落没有过多的记载。

公元前 16 世纪，商兴起灭夏（公元前 16 世纪~公元前 1066 年），势力直达东部沿海，徐淮地区都在商统治之下，中原地区人口渐渐向东部地区流动，与徐戎、淮夷、东夷杂居在一起，但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奴隶主逐渐占统治地位，并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氏族部落，形成有多个家族并存的村落。村落的建筑，虽然仍以夯土墙草屋为主，但建筑体量、质量存在明显的差异：奴隶主住在带有院落的房屋，规模较大；奴隶主属下的奴隶住在低矮、简陋的篱笆泥土墙草屋，形成与早期的氏族部落不同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

但人口的流动必然带来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原与沿海地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商时的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鲁南、苏北地区是重点区域之一，奴隶制扩大了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之间的劳动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交换，奴隶主贵族成为拥有特权、坐享其成的阶级。连云港地区商代遗址大多与新石器时代遗址呈叠压关系，形成多个层面的文化层，锦屏山下曾出土编钟，其他地方也曾出土类似的青铜器用具，都带有殷商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文化的风格，这与商时发明青铜器冶炼技术有关。中原地区商代遗址中也发现龟甲、鲸鱼、鲟鱼等鱼的骨骼以及海贝等，显然是来源于海边，是通过交换手段和贡纳的方式而获得的。

西周时期对东夷部落毁灭性打击

西周时期（公元前 1066 年~公元前 771 年），周灭商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从周武王

起，把自己的亲属和功臣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但奴隶制仍然延续下去，奴隶主贵族实行世袭制，奴隶和土地属奴隶主所有。同时，实行安抚政策，周武王把商纣王儿子武庚封为诸侯，留在殷都，又派人去帮助武庚，实际是监视。武庚感到不自由，想制造内乱，重新恢复殷商王位，就和管叔、蔡叔等人串通，联络一些殷商贵族，还煽动东夷几个部落闹起叛乱，徐戎、淮夷的部落也配合武庚蠢蠢欲动。周公利用三年时间平定了武庚的叛乱，并东征淮夷、东夷地区。《史记》记载：“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代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是说周公担任太师，向东征伐淮夷氏族，灭了奄国，把它的封君迁徙到薄姑。成王从奄国归来，住在宗周，写作了《多方》。已经废灭了殷家的王命，袭击了淮夷，回归到王都丰，写作了《周官》。重新正定了礼乐，各种制度进行修改，百姓和睦，颂扬歌声兴起。成王又东征东夷。息慎部落来庆贺，成王赏赐财物给荣伯，并指令写作了《贿息慎之命》。

周公东征，对东部沿海的东夷部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东夷部落直接参与了武庚的叛乱，东夷地区是周王朝平叛的重点地区。当时，云台山随着海平面升高已脱离大陆，成为海中岛屿（郁洲岛），但有的史料认为云台山局部地方仍与大陆相通。西周军队占领沿海后仍渡海进入郁洲岛追剿东夷部落残余，郁洲岛是东夷部落最后的根据地，没有任何退路，必定要拼死抵抗。今云台山大村至墟沟一线是西周军队的军事前沿，也是东夷部落抵抗最激烈的地方，东夷部落基本灭亡，西周贵族的将帅和士兵也战死较多，战死后埋葬于此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京博物馆考古专家在清理大村遗址时，曾发现西周古墓，出土铜鼎、铜鬲等，这些青铜器都是西周将士的随葬品。

商灭夏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到西周时，青铜器已经普遍应用于战争和奴隶主贵族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成为奴隶主贵族和领兵头目的殡葬品。新沂三里墩、赣榆青墩庙、下墩庙等遗址发掘，在龙山文化层

(新石器时代)之上都覆盖有较大面积的西周文化层;东海青湖、房山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覆盖有商周时代的遗物,如陶鬲、铜箭头等。二涧水库发现的西周铜器群,就是西周用兵时带过来的。表明这一带历史上曾有西周人活动、居住,同时也说明西周人曾经统治过这个地区,但沿海东夷地区经过毁灭性打击以后,多年人烟稀少。

春秋战国时期沿海部落的发展

从东周起,开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公元前 770 年—476 年,战国公元前 475—221 年)。近 300 年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到了鼎盛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时期,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各霸一方,逐渐强大起来,形成秦、鲁、齐、楚等并存的独立王国,这些独立王国逐步架空了周王朝,失去控制。各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武力吞并,向外扩张,带来 200 多年的战国纷争时期。

《史记》记载,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末期,诸侯国纷起林立,相互交战。其中北方比较强大的齐、鲁等诸侯国与南方兴起的吴、越及西南方的楚国等诸侯国在现徐州至连云港的徐淮地区长期对峙,相互交战,各有胜负,吴国几次进入齐、鲁境内又撤回;越国勾践卧薪尝胆逐渐强大起来,向北进攻吞并吴国,并长驱直入逼进齐、鲁,深入境内直取琅琊(今山东胶南一带),琅琊占领后为越国都城,后被兴起的楚国灭掉;战国末期,楚国又被中西部兴起的秦国灭掉。齐、鲁统治这一地区 200 多年历史,吴、越统治这一地区近 200 年历史,楚国统治这一地区近 100 年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连云港地区先后经历了几个诸侯国的长期统治,南北经济文化都留下了印迹。春秋时的齐鲁经济文化占主导地位。历史记载:春秋时,连云港地区属鲁国附属的郯子国,而偏北的赣榆县在莒、纪两个小国境内。《路史》:“纪鄆,国名,黄帝后……赣榆东北有纪城,此纪鄆也。唐并入东海,今怀仁东北七里有纪鄆城”。《海州直隶州志》:“今县西十五里有莒城镇,即莒城”。纪鄆城是最早建立的古城,在今赣榆县柘汪东,后因海水浸入淹

没。纪鄆城是纪国的都城,其管理范围和功能作用客观上适应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比之早期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有着本质的区别。

史书记载,春秋时,齐将高发率兵攻打莒国,莒国公被打败逃至纪鄆城,齐兵继又攻打纪鄆城,莒国公从西门逃出,后亡命于他国,齐遂占领纪鄆城。说明当时的纪鄆城的城池有相当规模,但在没有发明秦砖汉瓦之前应当是一座土城,城墙是就地取材用泥土夯实垒积,城内房屋仍为夯土墙草屋。但由于已经开始采用炼铁技术和商代以来广泛应用的青铜技术,兵器和生活用具都是用铜、铁制作,这又比早期的氏族部落的文明程度有很大进步。纪鄆城如果没被海水浸入淹没,可能会留下古城遗址和众多遗物。

齐鲁会战也留下了历史记载。鲁定公十年(公元前 499 年),齐鲁两国军队在夹谷(今赣榆西北)列阵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孔子和子贡皆为“以礼非兵”奔走,在孔子和子贡的劝说下,双方罢兵而会盟,成为春秋史上著名事件。今夹谷尚遗有明代追忆此事而立的齐鲁会盟夹谷的石碑,碑文为:“孔子相鲁会齐侯处”(见下图)。



“孔子相鲁会齐侯处”碑

齐、鲁等诸侯国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内实行等级分明的职官制度,孔子曾到郯国专门考察职官制度,还乘小筏过海,在云台山停泊,登朐山(今孔望山)观海。当时的海州湾向西凹进很深,在现赣榆县墩尚以东,从山东境内胶南一带过来直接走海州湾渡海到云台山一带是必然的。

随着盐业生产经营发展,开始建立盐业管理制度,《海州直隶州志职官》中就记载当时为了加强盐业管理专列盐官。实际从西周起,这一带沿海就兴起盐业,春秋时已有相当规模,从今山东日照城南的涛雒向南至赣榆县青口西、西北一带(当时归齐国管辖),是最早的盐业生产区域,从刮盐、扫盐的原始摄取方式到夙沙氏“煮海”为盐,亦称煎法制盐,煎法制盐就是在大海边滩涂上支起锅灶,用干草烧海水,水熬干后从锅底取盐。中国最早的煮盐遗址现存于赣榆与日照交界的涛雒镇周边,在云台乡于公疃也曾经发现过古代煎盐遗迹。以后向南发展,特别是商周以后,受上游河水冲积,沿海滩涂面积增加,煎法制盐进一步扩大规模。沿海一带煎盐灶民的出现,形成新的部落群体。

战国中后期,因越国和楚国统治时间较长,经济文化影响较大。在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中,大多有战国时期的遗存迭压。海州二涧村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曾发现战国时期的陶水管,说明当地人类活动已经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推测当地可能有战国时期的城址,但也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部落遗址,这里北靠大山,朝向好,便于人类活动。灌云县板浦镇龟腰桥西距地表1米深处出土的一座战国墓葬中有丰富的陶器,尤以灰色泥质陶制作的锄、镐及簸箕等农具冥器有一定特色。陶农具冥器的出土反映了当时当地农业生产的规模。连云港北固山墓葬出土的兵器以及秦山岛挖掘的内何印纹硬陶陶片皆与此有关,海州锦屏山东南侧尾矿坝的石窟下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洞穴300多个,当地群众称之为“藏军洞”,据专家考证,多为吴越相争时留下的遗迹。

在接近淮河下游的地方,受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引进南方的水稻栽培,

蚕桑也比较发达,显然具有吴越文化的特征。纺织盛行,当时织的布叫“楚布”;考古挖掘出土的文物中,还有楚人用的钱币和具有楚国风格的漆器、铜剑等。说明南方移民在此地定居并长期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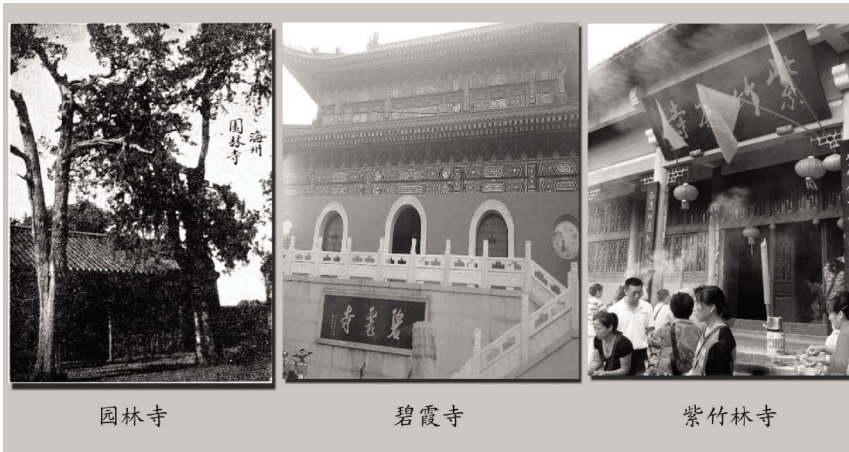
以朐山为中心的沿海一带,受南北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发展。实际连云港地区早在新旧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并形成早期的东夷氏族部落,夏启时,受到一次大范围围剿,西周初期又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东夷氏族部落衰落,春秋战国时期才逐渐恢复。原东夷部落活动的云台山,因海平面上升逐渐脱离大陆成为海中岛屿(古为郁洲岛),受地域条件限制人烟仍然稀少。今南城的凤凰山与今海州的孔望山隔海相望,形成南北向的海峡,古称第一道鹰游门海峡,前云台山与后云台山之间形成第二道鹰游门海峡。云台山脱离大陆,朐山成为新的沿海区域。

这里资源丰富,水运方便,战国初期开始就有江南、江淮移民在沿海一带落户,形成一些新的村落。如前所述,云台山、锦屏山山体下的大村、二涧村、陶湾、九龙口等遗址都有战国时代部落的遗存,有的与新石器时代或商代遗址呈叠压关系,说明这些地方当时的地理位置较好,有利于人类活动而聚人成邑。

朐山山体北面有一块比较大的山麓台地,地势较高而又平缓,南侧靠近山根有天然形成的排洪沟,北面近临大海,东有孔望山为天然屏障,往西呈微坡状渐至今蔷薇河边,自然条件较好,至战国末期,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村落。台地的东侧明显高于西侧,有利于排洪、防潮,民居相对集中,人口比较密集,家庭作坊和手工业生产也有一定的规模。这可能也是古海州城最早时期形成的定居点。

春秋与战国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水岭,战国时期的诸侯纷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奴隶制走向灭亡,奴隶逐步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农民、手工业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连云港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良好的区域位置带来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秦统一后建立朐县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土地学会)



海州的寺庙

海州九庵十八庙探源

孙大伟

素有“淮海东来第一城”之称的古海州,地处“南蔽江淮,北控齐鲁”和海陆丝绸之路的交会点,区位独特,历史悠久,古迹众多。境内的国宝将军崖岩画,就是四五千年前的海州先民们,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生活、劳作、祭祀的遗存。另一国宝孔望山摩崖造像,则记载了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初传入我国的史实,其他古建筑、古驰道、古战场的遗迹,遍布州内山水之间。而反映佛教和道教在海州两千年来流传和弘法的宗教文化,及其大量的佛教寺庵、道教宫观神庙,则是古海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处古丝绸之路东起点和海上丝绸之路登陆点的古海州,佛教传入较早。而被称为海上仙山的云台山滨海近陆,是我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佛道两教都把海州作为他们弘法的理想场所,竞相兴建寺庙宫观。范围不大的孔望山,既开佛教在海州流传的先河,又是我国道教最早的建筑东海庙兴建之所。作为治所的海州古城内外及山川之间,佛道两教历代兴建的寺庙宫观建筑比比皆是,虽代有兴废,但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就达六十余处,直到清末民初,仍有“九庵十八庙”之说。这些风格各异、造型精

美的寺庙建筑,既反映了佛、道教在海州的兴废交替,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融合的见证,是两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缩影。这些寺庙,体现了宗教文化参与、融合并最终创造出海州辉煌的古文化的历史过程,寺庙中雕刻、绘画、经典、碑刻等应有尽有,其中许多是中国古建筑和雕刻艺术的精品,具有浓郁的东方文化色彩。同时,这些寺庙也是人们进行宗教文化生活的场所和休憩游览的风景旅游胜地,以及民间对外友好交流的窗口。

古海州佛、道教长期并存,但却有各自的弘法基地,即有各自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佛教的寺和庵,是供奉佛像、存放佛经的场所,是佛和菩萨的“住宅”,也是出家僧人进行佛事活动和他们修持、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而道教的宫观神庙,则是道教所奉之神的祭祀场所,是道教神职教徒(即出家道人)修习道教的斋仪和道术,以及生活居住的地方,是弘扬道教文化的基地。但由于道教是多神教,这些祭祀场所大都是专门祭祀某位神仙的神庙,因而专指性很强。

从公元一世纪初的东汉初年,直到晚清的一千九百年间,古海州都在陆续兴建寺庙。大量寺

庙出现的原因,一是古海州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人文环境。二是与我国佛教、道教的兴衰密切相关。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中叶的汉朝传入我国后,第一次兴盛于晋,至隋、唐进入鼎盛时期,清朝又趋复兴。海州北齐年间建成的龙洞庵,唐朝前后建成的园林寺、紫竹庵以及清朝建成的百子庵、观音庵、神州庵等,都见证了佛教兴衰的过程。道教自汉朝初年形成后,元明两代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即趋衰微。与此相关联的是,海州碧霞宫、天后宫、真武庙等道教的宫观神庙,大部分建成于这个阶段,见证了道教当时在海州的兴盛情况。三是相当一批数量的寺庙,是由封建王朝直接诏令全国各地官方设置的,是其宗教政策的直接反映。如明清两朝,都诏示天下,分别在学馆和郡县以上行政单位兴建文昌帝祠,为其科举选士制度服务。海州的文昌宫、社稷坛、城隍庙、蒲神庙等,都是官府出资建造的。第四,寺庙众多也是一个地区人文水平较高的反映,是与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俗话说,盛世修庙。没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实力,建不成寺庙。古海州物产丰饶,为兴建这些寺庙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以寺庙为基地的佛道教文化,特别是其中关于教育、科技、医药等学术成果与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又推动了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及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甚至形成了不少至今仍然存在的民俗,这是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积极方面。

改革开放后,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并发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等法规。1988~1992年,市和海州区政府先后修复了龙洞庵、百子庵(准提寺)、观音庵(古佛庵)。1994年,恢复碧霞宫佛教活动场所,更名为碧霞寺。2000年,恢复紫竹庵佛教活动场所,定为首堂寺院,更名为紫竹林。区内共有二寺三庵5座佛教寺院。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海州区还积极筹措打算恢复著名的园林寺及文庙等寺庙。

区内最早建成的寺庙是位于孔望山西南角山坡上的东海庙。该庙建成于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是我国最早建成的道教庙宇。庙宇虽然早已湮没,但残存庙碑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国家文物部门已划定其遗址保护范围。

现存于世且历史最悠久是位于孔望山南坡的龙洞庵。这座寺庙始建于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其历史仅比“海州”这个地名晚20余年。

现存最大的寺庙是占地十亩的碧霞寺。这座寺庙原名碧霞宫,建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缘于这座寺庙的祭祀活动发展而来的白虎山庙会,是海属地区童叟皆知的著名庙会,其历史已有300余年,至今长盛不衰。

现存海拔最高的是位于锦屏山中的紫竹林。这座庙宇建于南唐年间(公元960~975年),因庵内多紫竹而得名,周围风景优美,是名副其实的深山古寺。

(作者单位:海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龙洞庵



观音庵



百子庵
(准提寺)

海州的庵

兰孟与云台山三元宫碑

张茂田

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云台山志》等志书皆载有清康熙十九年大学士索额图“云台山三元宫碑、云台山观音殿碑及漕运总督帅颜保”、“重建海州云台山青峰顶纪碑”的条目,此三碑撰书时间同为康熙十九年,同为内翰林院侍讲学士孙一致书丹,太常少卿杨名耀篆额。其中有两块碑,《嘉庆志》按:“有二丰碑因重不能运山顶,遂亭(与“停”义同)于大村今断碎矣。”谢元淮《云台新志》按:“碑因甚重不能运至山顶遂停放大村,乾隆中,为牛斗所碎”。是碑确因甚重不能运上山顶而停放于大村的吗?真的是为牛斗而破碎吗?另一块碑石又在何处?这其中或是另有隐情,三碑的来由等历史谜团随着岁月叠加而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近日,翻阅《花果山志》读至石刻章,见帅颜保重建云台山青峰顶碑记文,下有编者按:“此碑原录于清崔应阶《云台山志》,漕运总督帅颜保撰文,孙一致书丹,杨名耀篆额,碑久圯。该碑后收入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寺观》注明转录于《复山集》和《云台山志》相核,《嘉庆志·碑文》和《云台山志》相去甚远,明显有后人篡改之嫌。因无原碑对照,仅录《云台山志》原文,以存对照”。这则编者按引起笔者兴趣,遂找出《嘉庆志》及《云台山志》与《花果山志》该碑文逐一对照,发现,诚如编者按所言:《嘉庆志·碑文》和《云台山志》相去甚远,确有后人篡改之嫌。但《花果山志》言“仅录《云台山志》原文”,亦有诟病。如从“仙灵圣真之所凭依以下”《山志》原文:“皆有未可一旦废者。如海州之云台,突处东海,相传为古郁州即苍梧之中峰也。”而《花果山志》则照录《嘉庆志》“当与清宁永奠者矣,云台为古郁州,即苍梧之中峰也”则有并未“仅录《云台山志》原文”之嫌。不过从编者按中,可知帅碑全文转录于清康熙时本地水流村人江之蕰的《复山集》,从侧面说明此碑当时并没有运到三元宫或其它地方。碑文很可能只还停留在纸面上。而清道光时《云台新志》按:停放于大村的二块碑石于“乾隆中为牛斗所碎”此说法不禁令人疑惑,材质为花岗岩的石碑,一般厚度在10厘米以上,按志书“此碑甚重”的说法,碑材无论高、宽及厚度都不会小的,重量不会小于八百至千斤。当时碑石或卧或侧立于大村道旁,就算二头蛮牛在碑石上作殊死决斗,想损坏如此厚重的碑石,谈何容易!该碑非人为决不可能轻易破碎。到底此几碑的来龙去脉如何,还要从当时云台山区发生的重大事件说起。

清初,清政权虽控制了整个中原,但沿海一带仍受到前明一些残余势力及倭寇的袭击骚扰,即史籍中所载的“海防不靖”。顺治十八年,实行严厉的靖边海防策略,放弃沿海岛屿,居民等皆

迁往内地,是为“裁海”。

当时云台山尚在茫茫大海中,虽与海州板浦相隔仅一渡之遥,但毕竟是海上孤岛,属可裁可不裁之列。时钦差大臣兵部尚书苏纳海,亲率诸王公至沿海视察,至板浦登船正要解缆启航之际,忽然间黄风击浪,云雾迷空,一班王公大人胆战心惊,决计不再鼓棹问渡,置三百里锦绣河山不顾,仓促回京。裁海令下,竟将延环三百余里的,有大村十八、小庄无数,住有上万居民千余年赖以生存的大好河山,划为界外,弃为撇履。竟成境外荒州,塞外禁地。于是,不管你是黎民百姓,还是方外之人,一律驱逐殆尽,否则以通敌论处,格杀勿论。一时间岛上狼烟四起,烧戮不绝。各式人等,见圣命难违,只好忍痛抛家别业,背井离乡,渡海逃难于四方。流落四方的有识之士,隔海遥望故居,“悲祖居荒废于棘榛,哭先人餒殍于地下”。于是联络、筹划,多方奔走呼吁,要求朝廷恢复云台。康熙十五年五月,祖居云台的海州生员江之藩、杨肤功、郑三乐、江之雍、成天章等人在漕运总督帅颜保衙门递上呼吁恢复云台的状态,请他题奏。得到朝野政要的赞同,康熙十六年由吏部侍郎哲尔肯及漕运总督帅颜保等奏复云台山为内地。康熙十七年闰二月,清廷颁旨,将原裁海令撤销,云台山复为内地,迁入内地山民僧侣,才又先后迁回,史称“复海”。

当时有一云台山僧人,号兰孟。祖籍山阳,出家云台山后顶北海观音寺。苦行经年,遇裁海之变,庙毁僧散,流离失所,竟沦为行脚僧人,四处挂单。僧兰孟于裁海有切肤之痛,见一班书生为恢复云台而奔走呼告,遂主动参与其中,“行脚淮上十余年,以苦行动当路”,以自身为出家人的方便,出入于上层达官贵人府第,宣化云台山三元大帝及观音大士的神灵,恳求他们对复海大业的支持。常年奔走在淮海间,为诸生充当信使,输送钱粮。间接为复海大事出力。其人不入经传,故生卒无考。其后复海事成,兰孟功不可没。吴铁秋老先生在《苍梧片影·书生复海》中引用《建陵山房集》中四句诗赞道:“清风证果鲁王孙,无相开山位业尊,谁识兰孟功行苦,老僧问活立松根。”复海后,僧兰孟回到阔别多年的云台山上,但此时山上庙宇,历经十七年的荒

废,早已倒塌颓毁不堪。兰孟在昔日金碧辉煌的北海观音寺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经堂,着手筹划复修大业。苦行化缘募集资财,穿街过巷,行走于官衙豪宅,宣扬佛号,求助布施。但云台历经17年荒废,元气大伤,百废待兴,民力难支,故兰孟虽经多年奔走,其效甚微。于是南下淮扬,北上京师,兰孟运用关系使出浑身解数,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即复海后的第三年,打通了权倾朝野的一品大员、朝廷大学士、户部尚书索额图。应兰孟之请,为倡修“北海观音寺”,撰写云台山观音殿碑记,在其碑记中,极力宣扬大士之殿,应与前顶三元宫“衰则同衰,兴也应同兴。三元造福,大士施仁,云台砥柱,水月观音”。但当时统治者出于其政治经济的需要,还是只偏向于前顶三元宫的修复,这在索额图和帅颜保同时为云台山撰写的三块碑记中可以看出。僧兰孟虽只替大士殿的复建而求告,但索额图还是撰写了两块碑文。一块为观音寺,一块为三元宫,以示等同。而多次上过云台山,为复海题奏的漕运总督帅颜保,时还在任上,干脆就题为“重建云台山青峰顶碑记”不分前顶,后顶,以示公允。只在其碑文的后半部分写有“其后顶旧有大士禅院,瞻礼庄严,盖释氏之观音,道家之三元,皆所以助圣人之不及,而阴寓救世之权者也……用是捐资倡修,鸠工以复之,前后坛场,各因其旧……其为仙灵所式凭,而有关于斯民之休戚者,必不容废而不兴也。”其实,索额图根本就没有到过海州云台山,其碑文中所言“大士之殿三元行宫皆焕然一新”,都是想当然之词。试想“复海”后只有区区三年之功,何以能“浮光耀金而焕然一新”?就是前顶三元宫的复建,虽然颇受朝廷、官府的支持与赞助,大概也才艰难起步吧。据乾隆三十七年崔应阶《云台山志》记载:“康熙三十一年,圣祖仁皇帝钦赐匾额‘遥镇洪流’四字,近二十年的时间,才初具旧制,香火益盛,但仍有不少殿宇颓废未复。”而兰孟单凭一己之力,复建后顶观音寺,谈何容易。兰孟经过多年的奔走化缘,虽筹集一些资财,但与复建后顶观音寺庙宇的需求相差甚巨。到康熙三十一年,康熙皇帝钦赐“遥镇洪流”四字与三元宫,三元宫的影响力度更强,人气、资财的流向更加倾向于前顶三元宫。

此时的兰孟,已是年老力衰,复建后顶观音寺的理想,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但历年聚集的达官贵人,文豪书家的诗字、碑文还无暇顾及实施。乘还有余力着手施建,由于碑刻的石材要求较高,而云台山石材不是刚脆易裂,就是纹理不对,所以云台地区现存的碑刻石材,大多是从外地购运而来的。海属地区能产碑材地大约有三:一、赣榆班庄,石材色白而细腻;二、灌云小伊,石材质青而平滑;三、东海房山,石材质微黄而柔顺,后顶观音寺废墟上有一块所谓“无字碑”即属第三种房山碑材。这也正是兰孟当时舍其近而求远,不惜渡海,千辛万苦将碑材搬运至大村的原因。云台山上历代遗留崖刻、碑刻众多,究其兴建方式,无外乎以下几种:一、一班文人骚客、达官贵人玩山游水至兴浓,乘兴挥毫,留字迹于山水间,或自掏腰包,或豪客赞助,请匠施工,诗词书法遂留存于后世,此类崖刻居多;二、由官府或社团出资施建的需永久保留的例律、告白及赞颂类碑刻;三、一些实体为宣传知名度和增强影响力而寻求一些文豪书家,当权高官者撰写诗词、题刻、纪文,由实体自行施建,此类一般庙宇及经济实体居多。兰孟所持有的碑文即属后者。

索额图的碑文撰写时间虽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实际时间应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后至四十二(1703)年之间,这从后顶倒坐崖上现存的崖刻可以看出来。倒坐崖上两方崖刻署名一为赵铎,一为江都人杨廷镇,例贡生。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五年(1691-1696)杨廷镇任海州训导。万肖裔题刻:万肖裔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693-1697)任海州知州,其中“曾经沧海”题刻落款为康熙甲戌仲夏十二日,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当时的后顶与现时的后顶遗址大概相差无几。相信作为堂堂知海州的万肖裔,不会在仲夏季节,不顾荆棘丛生的崎岖山路,为游览荒芜凄凉、遍地瓦砾的北海观音寺,词兴大发去题刻抒发“移我情”!只有僧兰孟,将求得的诗词、题勒,请工匠镌刻在凄凉的后顶观音寺遗址的崖壁上,而“曾经沧海”题刻落款时间甲戌仲夏十二日,即康熙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应视为知州万肖裔应兰孟之请,提笔亲书墨宝时间,并不是镌刻时间。放在后顶遗址

瓦砾之上的“无字碑”,大概就是兰孟进京所求索额图的“云台山观音殿碑”了。从山下将碑石搬运到山顶,路上磕磕绊绊,难免有碰撞磨损之虞,倒不如将碑材运到目的地之后,再行刻字来的保险。如果后顶遗址上的无字碑,是该寺原来固有的,是不可能倒在瓦砾之上的,而应在瓦砾的下面,所以此碑应是兰孟从山下大村运往后顶的索额图碑。

兰孟在京城募得三方碑文,只有索额图“云台山观音殿碑”文与后顶有关,而貌似公允的帅颜保“云台山青峰顶碑”则游离于前后顶之间。按兰孟当时资财力度,只能把关系自身利益的碑石运送至后顶,而余下的“三元宫”与“青峰顶”碑石,则遗留在大村,后断碎,这是后话。既然碑文未刻,又如何留传至今?清《嘉庆海州志》按:转录于《复山集》。《复山集》是清康熙间云台山水流村人江之菴编撰的,是记录有关云台山“裁海”、“复海”始末的文集,应当是“裁复海”最权威的史料。而兰孟与江之菴的关系非同一般,兰孟进京求得的当朝一品大人的墨宝,不可能不去江之菴处炫耀一番的,江之菴把三块碑文收录于《复山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兰孟既然把准备镌刻索额图云台山观音殿碑文的碑材运到山上,为何又没有完成呢?是索额图出事了!索额图,清满洲正黄旗人,初授侍卫,康熙七年授吏部侍郎,十九年因病免大学士改议政大臣,三十五年从康熙征葛尔丹,四十年以老乞休,四十二年五月“上以为大学士贪恶革退,后复起用,罔知愧悔,乃怙过不悛,结党妄行罪,执交宗人府,诛族。臣党附索额图者,严鞫,藏有索额图私书者,论死”。清史称“索额图诚为本朝第一罪人也”。清康熙时期的“文字狱”非同寻常,动辄株连一大片,闻者变色,沾者则亡,大村竟有索额图碑文,这还了得,哪里管他是帅碑还是索碑,赶紧把它毁“尸”灭迹,对外宣称:“是二头蛮牛相斗,撞碎是碑”。物证既灭,罪责也就推脱了一干二净,只落得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至于山顶倒坐崖下,北海观音寺正殿废墟上准备镌刻索额图观音殿碑纪文的碑石,在碎砖断瓦上,一躺就是三百年,以无字碑的面目,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猜想。

(作者单位:开发区朝阳镇志办)

是“郁洲”不是“郁州”

李思慧

从地名“郁州”说起

1990年,市地名委员会审议新区的地名,其中有个“郁州路”。在现代汉语里,“州”字已经没有“水中陆地”的含义,是指旧时的一种行政区划。连云港的古今地名中,也没有“郁州”这一明确的行政建置。中国历史地理上的“郁洲”,是指海中的大山。如《水经注》记载:“朐县……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郁洲。《山海经》所谓郁山在海中者也。”郁洲,凸显了连云港大山大海、山海相拥的城市特色,为了呼应经典文献中的“海中”、“大洲”,应该用“郁洲”。而且,郁洲,也标示出海上岛陆繁茂的植被,绿色、浩淼、令人神往。可是,有人说许乔林说,“洲”、“州”是一个字,用“郁州”没有错。

作为《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辑”和《云台新志》的“纂辑”,在《云台新志·考证》中所说的“州、洲,则古今字一”,是错误的。“州”与“洲”的涵盖有着明确的区分。退一步说,即便从古代到嘉庆年间,两字可以通同,今天,此两字决不可混淆。换句话说,许乔林说“古今一字”,是不严谨;现代信息领域里再将这两个字混为一谈,则是谬误。

许乔林在地史考证方面的疏失不是偶然的,比如,他说《汉书》记载于定国是“郯人”,所以,于定国的父亲、狱吏于公也是“郯人”,被于公辩护的孝妇也就是郯人。——他不知道汉代政治中有严格的异地做官的制度——这一粗率

的推断,让地处朝阳的孝妇遗迹蒙尘 200 年!其实,由汉朝皇室名儒刘向著述的《说苑·贵德》,早于《汉书》100 年,所记录的于公是“下邳”人。几乎所有的各类清代海州方志对这一地名及其相关文献皆不加辩证,人云亦云。5 年前,笔者在《东海有孝妇,何处见真迹?》里作了剖析。所以,许乔林的话,不足为凭。

“洲”与“州”,大相径庭

文字学早已明确地告诉我们:“州”、“洲”有“大小”之分;犹如“他”、“她”有男女之别。我们来咬嚼一下“州”与“洲”——

汉代以前,只有“州”字,没有“洲”字,据我国第一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说文解字》:“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段玉裁的注说道出了“洲”字出现的缘由:“俗乃别制‘洲’字,而大小分系矣。”在使用过程中,人们感到需要有一个涵盖更大的字,去指称“四大部洲”、“海中大洲”一类的大陆和海岛。“洲”一旦出现,“州”、“洲”的含义就有了区分,汉魏、南北朝以后,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州郡制,“州”的主要含义,指行政区划。而无论在海、还是在河,也无论大小的岛陆,逐渐演变为“洲”。到了现代汉语中,“州”、“洲”已经成为毫不相干的两个字。

《金石大字典》举出了“洲”字出现的实物证据——唐碑的篆额。连云港市现存第一部地方

志是刻成于 1572 年的《隆庆海州志》，书中“州”与“洲”的使用，泾渭分明。在记录郁洲山时，一概用“洲”字，在记录行政区划时，“徐州”、“青冀二州”、“海州”一概用“州”。该书的明代原刻现藏于宁波天一阁。此为记录“郁洲山”应该用“洲”字的铁证，距今 440 年。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是由晚清举人臧励觥主持、30 多位史地学者合作、用 10 年时间完成的“上下纵横、今古悉备”的地名大典，其中只有“郁洲”，没有“郁州”。《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以及台湾的《学典》在引用《尔雅》、《诗经》等古籍中的“洲”字时，皆用“洲”，无一用“州”。

文字的功用就是要准确、清晰地表义，地名亦然。正如《荀子·正名》所言：“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当表示“水中高土”、“水中可居”的“州”字不能形容更大的海上陆地岛屿而约定俗成出“洲”字来“分系大小”时，当“州”字已经失去原有表义而主指行政建置时，慎重地辨析文字源流，面向社会，趋从大众，服务现代是必须做到的。作为政府的地名管理机关，尤应如此。

趋从现代，呼应经典

较早的“朱本”和 1592 年由金陵世德堂书坊刊印的“世德堂本”是现存最早的善本《西游记》，书中指述傲来国、花果山时，皆是“东胜神洲”、“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清楚无误。在全国 28 处花果山中，唯有连云港的山是海上山，这是名山的硬件，无可替代，三点水不能去掉！又如，吴承恩指述杨二郎的居所时也用“灌洲”，寓指家乡的灌河口和海中的开山岛。可是，10 年后，福建书坊的闽刻本《西游记》不知就里，改成了“州”字，以至，杨二郎的故乡与四川的灌州扯上了关系，此次重新整理本《西游记》在国家立项，我们郑重地为之正名并出注，以昭告《西》学史。2011 年灌南县二郎庙落成时，我特意为大殿的脊题拟出了四个字：“昭惠灌洲”，并从吴承恩稿本版中集字。“昭惠”与二郎的封号相关，寄寓了惠泽灌口海陆的愿求，而灌“洲”——不是灌“州”——才是杨二郎的老家。灌南人说：这三点水，居然事关重大！又如，以海州苍梧山

为主要背景的另一部经典《镜花缘》开篇第一回写海上三山的“瀛洲”之“洲”，三点水也赫然在目！

古代汉语中，只有“他”，为了区分性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刘半农推出了“她”。90 年后的今天，有谁愿意拽着自己的辫子遛回晚清——无论男女，只许称“他”？“洲”字已问世 1000 多年，“州”字也早已改变原有的功用，21 世纪的连云港却有着路、山、碑、公园、小区、商号、中心、酒店等铺天盖地般的“郁州”名号，当地人莫明其妙；观光客看作是行政区划。区划，有着鲜明的社会属性，“郁”字的人文表意是“忧郁”、“郁闷”、“抑郁”，没有人愿意用来作为一个区划地名中的定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地名寄寓着人们对丰茂、昌盛、吉祥、明朗的翘盼。我们为什么不能顺乎民俗，趋吉避凶，舍弃这个多义字的纠葛？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地名分类主要是“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行政区划名称”。“郁洲”的自然实体属性确凿无疑，在《山海经》中，郁洲被称为“海外之大壑”，虽然迭经沧海桑田，如今郁洲山还包含着江苏最高点和第一大岛。连云港人为什么刻意要掩盖它的“大”？因为在海上才有的特殊气候和繁茂的植被，为什么要割去它的海？因为有海，连云港花果山才有正宗的名著品位，花果山大道上的路牌为什么夺去名山中的水？面对着康熙的“遥镇洪流”题刻，江苏最高点花果山主峰地名碑背后的现代汉语说明，为什么也非要强拗着删去三点水？玉女峰明明早已载入《云台补遗》，旅游主管部门在推介出版物中为什么言之凿凿——“这是六十年代部队起的名字”？

还有人说，有的线装书中，“州”、“洲”通用嘛！为了节时省力、盗版牟利，书坊刻工不规范的用字，太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二版《西游记》中的很多讹误就出自刻工的所谓“巧写”。再者，即便是过去曾经相通不能算错的字，如“畔”之于“叛”、“蚤”之于“早”，已经成为历史，作为面向大众、服务现代社会的地名，既要有准确的指实和文字规范，也要有益于城市的文化建树。

（作者单位：连云港市花果山景区管理处）

『斗战胜佛』品牌打造 对于连云港发展的深远意义

刘
成
文

连云港花果山是《西游记》主角——孙悟空的“老家”，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孙悟空已经成为连云港城市文化的一个象征，花果山也为连云港带来了摩肩接踵的旅游人群、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西游记》文化旅游节经过15年的发展，办了十届，更成为连云港文化的盛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斗战胜佛”是孙悟空在《西游记》中的最终归宿，打造“斗战胜佛”品牌，是孙悟空形象的进一步提升，也将成为连云港建设

西游文化城市的一个里程碑。

一、在文化建设上，“斗战胜佛”品牌能够进一步丰富西游文化的内涵

据老版《西游记》的导演杨洁说，1985年开拍时，她曾经向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先生讨教，希望他能够为《西游记》题写片名，但赵朴初拒绝了。赵朴初不题字的主要原因是《西游记》在第98回“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中，描写了阿难、迦叶在给唐僧经卷的时候，向唐僧索取好处费，结果没有得逞，于是唐僧只得到了无字之经。后来，师徒又重回灵山，献上紫金钵盂，才取得真经。吴承恩借此讽刺了明代社会贪贿成风，连佛教高层也不能避免的现象，但是却给佛教界留下了一丝阴影，认为《西游记》对佛教不够尊重。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和现实生活进行这种对号入座，实际上，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对佛教是敬畏和尊重的。《西游记》一书的主题就是西天取经，佛教经书在《西游记》中起到了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性意义。在《西游记》中，法力最大，连无法无天的孙悟空也逃不出手掌心的大人物就是如来佛祖。在唐僧师徒的取经路上，都有观音菩萨在暗中指点，她起到了一种母性关怀的作用。应该说，通过名著《西游记》的巨大影响力，使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传播。至于阿难、迦叶的索贿，只是一种文学上的戏谑，完全可以一笑了之，至少没有人会因为这个信以为真，对佛教就产生了怀疑。

进行“斗战胜佛”的品牌打造，是另一种弘扬佛法的行为。在《西游记》第100回“径回东土，五圣成真”中，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功成，然后由八大金刚，驾香风，将他们四人连同白龙马一起，带回了灵山。如来佛对五圣每位进行了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鉴定，然后给以封号。实际上，观世音在之前的14年取经路上也随时随地进行了考察、登记，可能对如来佛先推荐过，最后，唐僧、孙悟空被授予最高学位——佛，八戒、沙僧、白龙马被授予第二等学位——菩萨。孙悟空因

为在取经路上战天斗地的勇气、战无不胜的业绩,被封为“斗战胜佛”,可以说是实至名归。试想,一个曾经大闹天宫,叫嚷着让玉帝下台的毛猴,一个在取经路上靠着紧箍咒管着才没有恣肆的“大师兄”,一个虽然本领高强,却也满腹牢骚,两头冒尖的“天才”,最终却皈依了佛教,成为最高层次的佛,这不是充分表明了佛教的巨大感染力,同时也表明了佛教的无边宽容心吗?

因此,着力打造“斗战胜佛”,能够从更高层次上宣传佛教,推广佛教,拉近和《西游记》文学名著之间的距离,从而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二、在旅游建设上,“斗战胜佛”品牌能够进一步提升花果山的旅游品质

自1957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孙猴子老家在新海连市的花果山”这一历史性结论以来,我市围绕花果山这一极其宝贵的旅游资源,把《西游记》文化这一篇大文章做得风生水起、世界闻名。2002年10月31日,经彭云先生创意,以市政府名义,致函北京奥组委,推荐美猴王为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这一积极的行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瞩目,也吸引了国外媒体的目光。

花果山为我市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连云港人因花果山而骄傲。但是景区建设步伐与港城跨越发展的形势,丰富旅游资源和低下的旅游效益相比,显得非常不相称。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是特色不够突出。《西游记》中描述花果山是:“势镇汪洋,威宁瑶海……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可以说描绘得美轮美奂、令人陶醉。今天的花果山,由于地理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远离大海二十多公里,失去了当年临海凭风、势镇汪洋的优势。再加上过去对植被保护不够,少花缺果,给游客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景区内低层次、简易的民居大量存在,现代建筑与古代遗存杂处一起,抬眼望去,难以产生赏心悦目之感。再加上景区服务业档次较低,管理规范性不强,与4A级景区的金字招牌产生了较大的悬殊。二是开发层次偏低。从“食、住、行、游、购、娱”这旅游开发的六个层次来看,花果山基本还仅停留在行、游等较低层次上,而购、吃、住、娱等纵深层

次都还基本达不到。从购、吃上来说,花果山没有开发出自己特色的旅游产品、特色食品;从住、娱来说,游客基本上没有住在山上的,景区内没有大型的旅游主题公园,游客找不到旅游的进一步兴奋点。再加上景区没有和海滨旅游形成一体,游客游完山以后,没有到海边便捷的交通设施,海滨浴场收费也制约了一部分游客游玩的兴致。“游山”不能“玩水”,使连云港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整体充分的利用,旅游的综合效益难以得到提升。三是管理观念滞后。景区的开发建设,使花果山原有的山民成为现代化景区的工作人员。由于传统观念作祟,具有“靠山吃山”的依赖心理,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必须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近年来由于有关部门放松管制,景区内常住人口不减反增。人员负担的加重,使景区发展举步维艰。

“斗战胜佛”的品牌打造,将为花果山带来另一个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应抓住这一机遇,大力拓展它的外延,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使其在孙悟空顽皮、好斗的本底上,增加更多的佛教内容,使其成为花果山旅游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形象代表。具体操作,可以选择在大村水库附近建设大型“斗战胜佛”雕塑,使之成为游客进山路上必游的一个景点,和香客们进香的一个圣地。

三、在城市建设上,“斗战胜佛”品牌能够进一步打造连云港的城市形象

在三元宫山门两侧有这样一副对联:“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三藏东传并非小说所言”,该联由镇江江天寺首座和尚梦初撰联、湘籍著名书法家欧林德书写。它准确地诠释了花果山与《西游记》的关系,《西游记》中所描写的人物、景物在山中举目可得,可谓是“一部西游未出此山半步”。可以说既是对花果山《西游记》文化元素众多的美好赞誉,也是对连云港《西游记》文化整体不足的客观点拨,也就是说,连云港的《西游记》文化仅仅局限在花果山,对城市文化的整体提升效应还很有限。

“斗战胜佛”品牌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载体,为打造西游文化城市增添了新的内容。应按照“城市即旅游、旅游即城市”的理念,以《西游记》文化特别是孙悟空——“斗战胜佛”形象来规划和建设整个城市,使外来游客感觉进入连

云港就是进入了《西游记》文化的起源地,就是来到了孙猴子的老家,从它出生到成佛,在这个城市都有印记可循,这样整个城市的《西游记》文化特色都得到了突出和彰显。

在经济发展上,应尽快注册“斗战胜佛”品牌、商标,使“斗战胜佛”成为连云港的形象标志;在文化发展上,应组织市内外专业人员,聘请国内外专家为顾问,以“斗战胜佛”为主角,创作《西游记》文化精品力作;在旅游建设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建设《西游记》主题公园、“齐天大圣”主题乐园、“斗战胜佛”休闲旅游度假村等文化设施。同时加大城市绿化、美化、亮化的建设力度,使连云港真正实现春花遍野,夏荫如盖、秋果满山、冬雪晶莹,成为名副其实的西游之都、花果之城、人间天堂、盛世乐园。

四、在思想建设上,“斗战胜佛”品牌能够进一步提振连云港的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一种文明素养和道德理想的综合反映,是一种意志品格与文化特色的精确提炼,是一种生活信念与人生境界的高度升华,是城市市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城市精神代表着一座城市的整体形象,彰显着一座城市的特色风貌,引领着一座城市的未来发展。

连云港地处沿海,风景秀美、山海相拥。但是由于城市建设、发展一直和海有一段距离,造成城市文化中海洋因子严重不足,海洋文化中特有的开放、冒险、进取精神在连云港文化中体现不充分。而我们本乡本土产生的伟大人物——孙悟空却完全不是这样。他敢于挑战权威,偷吃“蟠桃盛会”的仙桃、大吃太上老君的金丹;他敢于战胜困难,“就是东洋大海也荡开路,就是铁裹银山也撞透门”,有了孙悟空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孙悟空是西天取经的主角。没有孙悟空,唐僧就寸步难行,就不可能到达西天。没有孙悟空,取经众僧就失去了主心骨。没有孙悟空的金箍棒,一切邪恶势力就会猖獗泛滥,人民苦难就不会消失。真经的取得,不是归功于唐僧的虔诚,而是归功于孙悟空的斗争。全部《西游记》如果没有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也就失去了它的思想光辉。

吴承恩把孙悟空的斗战胜气质一直写到成了“斗战胜佛”之后,依然维系老孙的旧容颜。他对唐僧说:“师父,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咒儿掣勒我?趁早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教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人。”如来佛封孙悟空为“斗战胜佛”,这正是对他斗争精神的充分肯定。

“斗战胜佛”——孙悟空这种上天入地、穿云入海的形象,百折不挠、敢于斗争的精神,能够为连云港的城市精神注入更多的创新和开拓因子,从而使连云港这座城市克服等待观望、因循守旧、保守僵化等倾向,从外因思维转向内因思维,从一域思维转向全局思维,从策略思维转向战略思维,最终走向博大精深、激荡澎湃的海洋文化,成为“新时期的沿海人”。

过去连云港也曾经进行过城市精神大讨论,得出的城市精神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就是因为没有自身特色。连云港城市精神应该将“斗战胜佛”的文化精髓有机结合,大力弘扬“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团结协作、乐于奉献的勤奋敬业精神,弘扬“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攻坚克难、愈战愈奋的拼搏进取精神,弘扬“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的持之以恒、坚韧不拔的自强不息精神,弘扬“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的创新创业精神。因此,城市精神可以设计为:“连云天下、山海为盟、创新开拓、敢写第一。”“连云天下”为连云港所处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在国家新一轮发展中的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山海为盟”为连云港的历史文化,象征着这个城市的情怀像山一样厚重,像海一样博大。后两句就是“斗战胜佛”精神在城市文化中的体现,一是“创新开拓”,要建设国家级创新型城市,要面向海洋,充分发挥首批开放城市的作用,在东中西区域合作、在苏北崛起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敢写第一”,这正是“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意志和精神,同样也是我们这个城市矢志不渝的追求,要抬高发展标杆,勇于担当,敢于竞争,不断自加压力,拼搏进取,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谱写后发先至的现代西游神话。

(作者单位:市委研究室)

抗战时期赣榆县党组织的发展

祝新华

赣榆县的党组织，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经历了建立、发展、壮大的成长历程。自从该县第一位共产党员、1926年春在北京读书期间入党的张竞同，于1928年2月，返乡与徐州党组织派来的侯文风等几位共产党员，在青口油业私立义成高等小学，秘密地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赣榆县党支部之后，半年时间，只发展了两三名党员，就被反动势力所绞杀。如果说赣榆县党支部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开始在赣榆大地播下革命的种子，那么，党的初步发展则到1929年秋。年仅17岁的共产党员卢柏玉受东海党组织派遣，来到赣榆县青口小学五年级插班读书，先后发展了高永谦等10余名党员，并于1929年底建立中共赣榆县总支部。但四个月后的1930年4月4日，中共赣榆县总支部，便随着校长吴若愚的密报及卢柏玉等6人被赣榆县政府的逮捕，而遭彻底破坏。本文拟就此，亦即抗战时期的赣榆县党组织发展情况，与诸君一道走进那段艰苦卓绝而又光辉灿烂的历史岁月，去体会创业之艰难，感受奋斗之辛劳，分享成功之喜悦。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两个“鲁东南特委”与赣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在中共党史上有好多奇闻趣事，党在山东的组织建设中出现过两个“鲁东南特委”即为一例。

1938年春，原为东北军的国民革命军第57军来到赣榆一带，其111师和112师都有党的地下组织。其中，112师地下党工委书记是伍志钢，1939年牺牲后，刘曼生，也就是谷牧接任书记。柘汪战役后，刘寄萍、张树仁、李克济等通过劳军，与57军加强联系。特别是李克济，他利用做邮差的工作关系，经常为57军投递书报和抗战宣传品，关系格外密切。为了加强对地方的工作，112师地下党工委决定建立中共鲁东南特委，由赵志刚任特委书记，负责诸城、日照、赣榆三个县的建党工作。1938年五六月份，赵志刚先后两次来到赣榆，找张树仁、李克济谈话，研究在当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问题。6月下旬，李旦夫受57军党组织派遣，到赣榆建党。他在县城昭忠祠对面的房子里召开了赣榆县第一次全体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刘寄萍、张树仁、李克济等。会上，李旦夫代表上级党组织宣布建立中共赣榆县特别支部，张树仁为书记，并确定其工作重点是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中共赣榆县特别支部，是抗战开始后赣榆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从此，赣榆县共产党员的活动逐步走向了组织化、正常化，开始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局面。

1938年8月，为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方向的指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鲁东南特委。中旬，特委机关在山东省莒县、现在的莒南县大店镇建立，景晓村任书记，刘居英、刘涌、崔介、李仲林、李均、张岗等为委员。特委负责莒县、日照、赣榆、诸城和胶县五个县的工作。10月，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召开干部大会，中共赣榆特支因尚隶属于57军地下党领导，加上没有与山东党组织建立正常联系，所以没有派人参加。此前，刘寄萍、李克济和在墩尚做教师的陶君彦等曾秘密组织“民先”，公开做些抗日宣传工作，并曾到过山东省委和鲁东南特委找党，但均未正式接上关系。到1938年冬，57军地下党组织与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赵志刚将隶属57军地下党鲁东南特委领导的赣榆特支，介绍给山东鲁东南特委。至此，赣榆党组织才正式改为山东地方党委领导。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

区省委鲁东南特委决定,撤销赣榆特支,成立中共赣榆党团,刘寄萍任党团书记,陶君彦负责组织工作,张树仁负责宣传工作,李克济负责青年工作。1939年1月,鲁东南特委在莒县桑园召开会议,决定派人到赣榆帮助工作,并决定将中共赣榆党团改为中共赣榆县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刘寄萍,组织部长陶君彦,宣传部长张树仁,青年工作依然由李克济负责。自此,赣榆县党的各项工作才全面开展起来。

1939年4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做出决定,成立中共莒赣临工委,负责莒县、赣榆和临沂三县边区的工作,目的是依托莒县向南发展,扩大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工委书记白炎波、组织部长曹明楼、宣传部长辛玮、军事部长熊化民、统战部长张子亮、青年部长范希彭、妇女部长刘琳,工委下辖莒县九区、十区,赣榆五区、六区和临沂五区。为了在赣榆北部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特委决定:赣榆工委宣传部长张树仁任赣榆五区区委书记,组织部长陶君彦任赣榆六区区委书记,赣榆工委书记刘寄萍继续留任朱爱周常备旅政训处主任,以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对朱爱周军政的改造工作。

“四地委”、“五地委”与赣榆党组织发展

中共“地委”组织是中共地方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织环节和组织管理机构,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发挥的决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在抗战时期,“地委”组织从制度上看呈逐渐严密、从设置上看呈逐渐增多的特点,而总的来看,“地委”的设置从全国的组织体系看还表现为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它确立了省(边区)和县之间一个地方层级的地位。至于此期间与赣榆党组织发生隶属关系的“四地委”、“五地委”,在山东党组织的发展史上,其下辖的各分支机构中均出现过。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成立第一区党委,下辖第一、二、三、四、五个地委。鲁东南特委即是第五地委,驻莒县。1940年10月,鲁中区党委成立后,五地委由鲁

中区党委领导。1942年4月1日,由鲁中区五地委与鲁南区四地委合并的中共滨海地委正式成立,辖日照、莒南、莒中、沐水、临沐、赣榆、海陵7个县委和莒北、日北、马陵3个工委。1943年4月,滨海地委撤销,成立滨海区党委,符竹庭任书记。政权机构仍称滨海专员公署,谢辉任专员。

“五地委”决定成立的中共莒赣临工委,到1939年6月就撤销了,它虽然对赣榆党的建设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赣榆工委实际并没有撤销,还在继续开展工作和活动,张树仁、陶君彦也没有到赣榆五区、六区任区委书记,而是继续留在赣榆工委原职上。1939年一年时间内,中共赣榆工委先后帮助建立了墩尚、西吴公、厉庄、大树、陡岭和西石沟等农村党支部,五区中队和县政工大队也建立了党的支部,积极开展宣传抗日和抗日活动。1940年3月22日韦家岭事件发生,朱爱周以身殉国,赣榆军政机构陷入瘫痪状态。4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任董毓珮为赣榆县长,5月1日,董毓珮在董家湾宣誓就职,随后就成立“五人反共核心小组”,提出反共反八路军三项措施,解散县政工大队。面对白色恐怖日甚一日,为保存革命力量,刘寄萍在征得上级党委“五地委”,即鲁东南特委同意后,提出工委改组方案,重新组织新的工委领导班子:张树仁任书记,孙德南、李克济、霍志仁为成员。7月7日,“五地委”指示赣榆工委,除一部分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继续留在赣榆坚持斗争外,工委机关全部撤出。7日夜,在五区中队武装警卫下,工委机关、县府政训处、政工队骨干分子和区公所部分做军队工作的人员,安全撤离赣榆,到达莒南县北甘霖村,并争取成立自己的人民武装,坚持抗战。

最早的中国共产党赣榆县委

1940年冬,原赣榆工委成员张树仁、陶君彦、李克济等已转移到四县边区游击队工作,主要从事武装斗争,滨海军政委员会为加强赣榆和临沂等“沐东”地区的领导,决定建立中共临赣工委,江华同志代表滨海军政委员会党委向邱也民交代任务,要他担任临赣工委书记,负责开辟新区工作。11月下旬,邱也民随山纵二旅东

进,开辟赣榆抗日根据地。赣榆北部解放后,邱也民与组织部长孙杰进驻黑林,与山纵二旅工作团团团长于允光及时文玉、孙化彬等共同研究,决定发展党的组织。

其实,早在1939年中共鲁东南特委在鲁南召开第一次区代表大会,赣榆派陶君彦出席。之后,赣榆便由鲁东南区的“五地委”改为鲁南区“四地委”领导。“四地委”是由1939年1月成立的中共鲁南特委,改为中共山东分局一区党委四地委的,辖临沂、临邳、邳马、临邳费峰四县边区、赣榆、东海、苍马、邳县等县(工)委,地委机关主要活动在临沂、邳城一带。1941年2月,“四地委”党委决定,撤销临赣工委,建立中共赣榆县委,邱也民任县委书记,孙杰任组织部长。中共赣榆县委在五区杨家岭村成立,对外公开名义是“赣榆县政治处”,县委书记邱也民为政治处主任。这就是赣榆县党的历史上最早的赣榆县委。从此,赣榆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积极开展对工农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区、乡政权,组建抗日武装,同时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不断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巩固根据地。很快,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工、农、青、妇组织逐步建立,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赣榆新根据地的开辟,得到山东省委和八路军115师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地领导机关和115师民运部都向赣榆派出工作团帮助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我党政策,发动群众,肃清匪特,改造村政,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41年春,115师民运部、山东省妇救会联合工作团,在团长王韬、副团长王照华、何波的带领下,30多名工作团员进驻五区赤涧、黑林一带开展民运工作;中共“五地委”工作团团团长来伯衡也带着30多名成员于4月下旬到达赣榆,在四区班庄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抗大一分校、山东省战工会等6个工作团也先后来赣榆,在六、八区开展民运工作。各工作团来赣榆后,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使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并协助赣榆县委筹建了四、五、六、八区的区乡政权。到1942年底,全县党员总数发展到1014人,其中,男性为943人、女性为71人,贫雇农占63%,中农、学生、知识分子占27.8%,地主、富农、商人占9.2%,分布在170个村庄。

(作者单位:赣榆县史志办)

从王宏鸣 到杨步仁

王滨

1941年2月的一个夜晚,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东海县朱范村,一个黑影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跑了出去,并一直跑到了当时的赣榆县城(今赣榆县赣马镇),投靠了日本人,当上可耻的汉奸。这个从八路军115师师部跑出去的人是谁呢,他又为什么要投敌呢?

抗战爆发后,国人奋起抵抗日军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但也有少数败类为了一己之利而叛变投敌,成为民族的罪人。而在这当中,从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当中出现的叛徒又是少之又少,但也正因为这非常少的情况的出现,在我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史上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恶劣的。抗战期间,八路军团级以上将领中叛徒投敌的主要有邢仁甫、张绍东、王宏鸣等人。文头提到的那个从115师跑出去投敌的正是王宏鸣。

王宏鸣,又名王凤鸣,江西人,1932年参加红军,后任罗荣桓警卫员,参加了长征。单从这一经历来看,王宏鸣也可以说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了。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5团政治部干事,参加了平型关战斗,之后随115师政委罗荣桓来到山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27日,115师先头部队685团进入苏鲁豫地区(其东面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由北而南相连,故后称湖西地区),与原来在该地区活动的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政治部主任王宏鸣,副支队长梁兴初。这里顺便提出的是在这个支队的领导成员中,除王宏鸣外,其余三人新中国成立后都被授予中将军衔。由此可见当时王宏鸣在革命队伍中已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了。王宏鸣除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外还兼任第四大队政委,梁兴初任大队长。

1939年5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2、3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1大队和第7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

第4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宏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王宏鸣又兼任了湖西军政委员会主任(1937年7月中共中央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建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为统一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这使得王宏鸣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湖西地区的最高领导人。

历史的时间总是那么巧合。就在王宏鸣暂时成为湖西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同时,康生从苏联回国后照搬苏联党内斗争模式提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内“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的“肃托”运动也开始在各抗日根据地展开。

湖西抗日根据地在当时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中并不是特别大,但在湖西地区开展的所谓“肃托”运动却在党内影响非常大,这份“功劳”就要归功于王宏鸣。

由于历史的原因,115师部队到达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长期和山东地方上的干部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一直等刘少奇到山东后才得以初步解决)。而王宏鸣正是利用自己主力部队出身,并且是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员的资格,同时手中又掌握着湖西地区党、政、军、民的大

权,开始了其打击报复地方干部的所谓“肃托”运动。

湖西地区的“肃托”从1939年8月开始。

王宏鸣伙同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河北人,后查明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等人首先在地委干部学校中开始抓“托派分子”,之后通过逼供不断扩大范围,“肃托”运动渐渐蔓延到湖西地区的所有地方党政机关。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300多名优秀干部被杀害。最后连部队干部也未能幸免,包括梁兴初在内的许多人被逮捕关进了牢房,面临被处决的危险。作为苏鲁豫支队成员的王宏鸣甚至还要求冀鲁豫支队领导人把其管辖区内的“托派”分子送到湖西由他处理。当支队长彭明治听说梁兴初被抓时急忙赶回湖西地区质问王宏鸣。丧心病狂的王宏鸣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准备把彭明治也抓起来。彭明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急忙发电报向罗荣桓等领导反映湖西地区的事态。

罗荣桓听到了这一报告后脑海里立刻闪现出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众多悲惨景象,他立即打电报命令王宏鸣停止杀人。为从速制止这一事态的继续恶化,罗荣桓同志冒着危险亲自带部队赶到湖西地区当面制止王宏鸣的疯狂迫害,被关押在牢里的几百名干部才得以幸免。

事后,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畏罪自杀,其他相关人员也分别受到了相应的处分。包括苏鲁豫支队政委吴法宪也因为没有及时制止王宏鸣而被降级使用。至于王宏鸣,由于他很年轻,又经过长征,上级认为他是受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在对他进行严肃批评后,将他调离湖西,分配到686团当团长。之后不久,上级认为对王宏鸣的处理太轻,又撤销了王宏鸣的团长职务,其本人一直随师部活动在滨海根据地。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关于115师干部配备问题给八路军总部和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王宏鸣因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这个报告惊动了党中央。1941年2月,中央在详细核实的王宏鸣的具体罪行后,认为应该判处徒刑。罗荣桓表示

拥护中央的决定，并检讨了自己对王宏鸣的姑息。在师部工作的王宏鸣听说了这一消息后感到自己这下彻底完了，升官发财的美梦完了，而且还要受牢狱之灾！怎么办，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

王宏鸣叛变投敌后改名叫杨步仁，被任命为汪伪 71 旅李亚藩部 121 团第二营营长。以后又升为团长。

王宏鸣的投敌给八路军 115 师在山东地区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是王宏鸣先后多次通过关系拉拢原 115 师的干部投敌，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熟悉鲁南滨海八路军的活动规律而积极为敌伪出谋划策，对我鲁南滨海根据地进行“蚕食”。

在王宏鸣的拉拢下，部分立场不坚定、吃不了苦的动摇分子也步王宏鸣之后投敌，115 师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团级干部）罗保成、第 57 军独立旅（原东北军一部，后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副团长李振东先后投敌。

王宏鸣为了显示自己队伍的特殊性，向日伪申请了特别番号：“皇协军别动队”，王宏鸣自任别动队总队长，下辖 5 个大队共 1200 多人。罗保成即担任其中一个大队的大队长。

由于王宏鸣熟悉我军滨海根据地的部队兵力部署和作战特点，所以他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得逞一时。我滨海根据地东部的海陵县（今东海县陇海铁路以北地区）最紧张时只能在东西不到 15 公里、南北不到 25 公里的小范围内活动。别动队甚至曾经一度推进到距 115 师师部驻地只有十几里的地方，对我军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驻滨海的八路军 115 师教导二旅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及罗荣桓创造的“翻边战术”，经过周密准备后于 1942 年 11 月开始，以八路军 115 师教导二旅四团三营、六团一部和第 57 军独立旅等部对侵占海陵县的敌伪军开始了海陵“反蚕食”的斗争。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王宏鸣的别动队只剩下了 200 多人，王宏鸣带队跑到由日本军队占领的海州城，而叛徒罗保成等 3 名大队长被我军活捉。罗荣桓亲自主持公审大会，枪毙了叛徒罗保成。

跑到海州的王宏鸣在日本主子的扶持下很快又纠集了 1000 多人马重新来赣榆县，担任伪和平建国军第 36 师第 71 旅二团团长的，并建议日军和我军争夺海岸线控制权，妄图切断我山东八路军和苏北新四军的海上通路。王宏鸣的行动严重干扰了我军的战略部署，阻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海上通道联系，尤其是对新四军来说更加麻烦，因为新四军人员赴延安多数都是通过海路到达赣榆柘汪口后再上岸走陆路。同时由于当时海上交通贸易往北到青岛及向南到上海多为日本人所控制，所以苏鲁交界处的海上贸易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柘汪口受到威胁对我滨海根据地影响巨大。为肃清这一干扰，保证海上交通的顺畅及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海上联系，1943 年 11 月，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政委符竹庭遵照罗荣桓同志的指示，指挥军区第 6 团、第 23 团等部队发起了赣榆战役，并取得了赣榆战役的胜利，歼灭伪和平建国军第 36 师第 71 旅李亚藩部 1600 余人，由于王宏鸣率部驻扎在海头镇，得以再次逃脱。之后，伪赣榆县长王成凯重新组建伪军，委任王宏鸣为第 71 旅 141 团团长的代理 71 旅旅长。

1945 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王宏鸣又投奔到了另一个大汉奸郝鹏举部并随郝部投靠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二处直属四支队队长。1946 年元月，郝鹏举在我军政治和军事压力下，在台儿庄前线宣布起义。叛徒、汉奸王宏鸣不敢回到人民队伍中，慌忙脱离郝部宣布独立。为此，他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褒奖。

全面内战爆发后，王宏鸣充当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先锋。1947 年 10 月，他率部向赣榆县解放区大举进攻，占领了沿海部分地区。但随后在我反击下又迅速败走。赣榆县公安机关曾先后三次发布通缉令捉拿王宏鸣。

王宏鸣和他的残余人马之后被黄伯韬兵团收编，而王宏鸣本人也在淮海战场被我军击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另有一说认为王宏鸣从淮海战场逃跑去了台湾）。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工办）

王友芝八十高龄参加共产党

张学贤

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许多人的终生追求,有的人是青年时期入党,有的人是中年或晚年入党,可你知道吗?在我们连云港市,有位老人八十高龄那年才被批准参加共产党,他就是工商界知名人士王友芝。

一、引人注目的三件事

王友芝,连云港市海州人,出生布业世家。解放后接受党的委托,筹建市工商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先后担任市工商联第一届至七届主任委员,八届、九届名誉会长;市民建第一、二届委员会副主委。同时还被推选为市政协三、四、五届副主席,市人大六、七届副主任,省人大六、七届常委,省工商联第二至五届常委,全国工商联第五、六届执委,2003年10月29日病逝,享年85岁。

我和王友芝同志是海州同乡,1956年以前从未谋面,但从家父和同乡人的口中,对他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少年时期经受艰苦磨练。王友芝生于海州大户人家,其父王树仁为了让子早日成才,在他16岁那年,就把他送到源信涌布号当三年学徒,挑水、做饭、替掌柜倒尿壶,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而后又把他送到鸿祥涌当三年店员,学习买布、做账。历经六年的磨练,为他打下从业的基础,直到1944年10月,才回到父亲经营的裕隆恒布庄。

二是带头迎接解放军进城。1948年11月6日,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从新浦、海州一带溃逃,王友芝、张晋阶等听说解放军第二天要来接管新浦,就组织带领六七百名工商界人士和民

众,敲锣打鼓地迎接解放军进城。消息传到海州,民众议论纷纷,有的赞扬王友芝胆大,为海州人争光;有的担心政局不稳,将来王友芝要吃苦头;还有人对其讽刺挖苦,说“王小鬼(王个头不高)想投机共产党,捞个一官半职”。事后,有朋友问王友芝:大家对共产党的疑虑还未打消,你还敢带那么多人去迎接解放军进城,就不怕老蒋再打回来吗?王说:国民党接收新浦三年商业萧条,民不聊生。东三省丢了,济南丢了,徐州也保不住了,国民党这一辈子回不来了。

三是带头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抗美援朝开始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1951年7月,临沂专区分配新海连市捐献一架飞机任务(约合人民币旧币15亿元)。开始,工商界畏难情绪严重,叫苦拿不出这么多钱来。经过市政府和工商联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才把捐献运动开展起来,其中,王友芝带头捐出600万元(相当于自家布庄资金的五分之一),发挥了积极地推动作用,保证当年11月底提前完成“新海连市工商号战机”的捐款任务。

其实,王友芝同志的精彩亮点还有很多。据市委统战部编著的《挚友人生》介绍,王友芝同志在组建商会,加强对工商界人士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中;在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文革动乱之后,恢复工商联活动中,都能热情的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发挥积极带头作用。特别是连云港市被确定为对外开放城市之后,王友芝同志带领工商联遵循“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干四化”的行动纲领,以经济咨询、信息服务、专业培训、海内外联络、安

置待业青年等为重点、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服务港城发展大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积极筹建工商联办公楼

1956年初,我由海州师范调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和王友芝同志时有接触。1989年6月调市委统战部工作后,我们一道共事,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形成忘年之交。

记得到统战部报到第二天,我在部里同志陪同下,到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走访。在民主路一个小巷的二层楼上,看望了工商联王友芝、苏立裕等同志,并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当我提到工商联办公楼陈旧,办公拥挤,将来有机会向市领导反映,改善一下办公条件时,王友芝告诉我他们正筹集资金,靠自身力量盖办公楼,解决办公用房问题。

工商联要建大楼,资金哪里来?事后了解,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市工商联办了好几个企业,业务量还不小,据说已盈利上百万。不过,好景不长,两年后不好的信息也陆续传到部里,不是广东的货款要不回来,就是在山西买的是劣质煤,想退货遭到拒绝……由于创办的企业问题众多,影响到班子团结和工作的开展,我和王友芝同志最后商定把工商联领导成员请到统战部开一次谈心会议。当时用三个半天时间(上午开会,下午回机关抓工作),大家开诚布公的交心,通过自我检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最后统一思想,明确当前主要任务还是抓好工作,贯彻市委各项部署,经营的企业缩小规模,减少人员,指定专人清理,遗留问题如实上报。

工商联办公楼没有建成,还落下一屁股债务,王友芝同志深感痛心,私下对我说:“干一辈子商业,没有失过手,未想到晚年出现这样大的失误,让我如何向市委、市政府交代!”当时,我对王老只能给予精神上的慰藉,烂摊子如何收拾,我心里也没有底。

1992年我离开工作岗位。多年后听说,经市领导和有关部门协商,工商联经办的企业全部撤销,工商联和王友芝同志才得以解脱出来。

三、年过八旬实现入党宏愿

王友芝同志虽然在大办企业中出现失误,

但纵观其一生,还是忠贞不渝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连云港市的发展做了不少好事,是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

在统战部工作期间,我发现不论大会小会,王友芝同志发言时,都要谈党的伟大成绩,给中国人民和自己带来的幸福,以及永远跟党走决心。谈到激动时,热泪盈眶,非常感人。有人怀疑他是作秀,我想如果是作秀,偶尔一次两次可以,多年如一日是不可能的。再说,在1957年整风反右时,有些工商界人士借机发泄不满,而他在发言时还是离不开上述三条,实事求是地想想,这正是王友芝同志的可贵之处。

我到统战部不久,王友芝同志就提到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的愿望。1990年9月,王友芝同志向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工商联副主委兼管机关党支部工作的徐家平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像王老这样的高层统战人士,我们不能擅自处理,待我征求市委组织部的意见之后再作决定。事后,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戴镇基同志在征求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后,要我转告王友芝同志:对其40多年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对其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愿望表示赞赏;考虑到王友芝同志在统一战线中的身份和威望,留在党外发挥作用会更大。听了市委这三条意见,王老非常满意,表示一定要按照党的要求做下去。

1995年冬,我被《新华日报》聘为特约信息员,主要任务就是阅读每天的市报、晚报,精选一些有深度的稿件传给省报。1998年6月29日,我在阅读《连云港日报》时,发现一则醒目的标题——“王友芝老人光荣参加共产党”,我细读之后,方知王友芝同志已于1998年4月30日正式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当即修改了标题,加上“连云港电头”,通过记者站传真机发送到《新华日报》信息处,第二天这条消息就在《新华日报》三版上登出来了,标题很简练:“八旬老人光荣入党”,王友芝老人的殊荣,在江苏大地传播,让全省人民分享!

(作者单位:市委统战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次 捕虫行动

张树庄

一、捕捉毒虫

1950年,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1952年1月4日起,美军对朝鲜及我国东北、青岛等地连续施用细菌弹,投掷苍蝇、蚊虫、蜘蛛、蚂蚁、臭虫、跳蚤等30多种带菌昆虫,以及蝙蝠、老鼠、青蛙、死鱼、树叶、棉花等多种带菌媒介物,在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34个县、市传播了鼠疫、霍乱、脑膜炎、回归热及斑疹伤寒等病原体。中央人民政府发起了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灭虫、消毒的防疫运动。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政务院于1952年3月14日召开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中央防疫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反细菌战工作,全国城市和乡村迅速开展以消灭病媒虫害为主要内容的卫生运动。新海连市委立即行动,在发现带菌昆虫到达新海连海边之前就采取措施,加以预防。新海连市于3月27日下午,召开防疫筹备会,拟以市长周子虹、公安局治安科长刘方云、市立医院院长赵健伍、市委秘书科长郑鹤、宣传部杜庚、妇联周瑞、青委王宽生、市府文教科严剑寒、炮兵团卫生队长、总工会李明信、武装部薛允松等11人组成防疫委员会,以周市长、赵健伍为正副主任,并于3月29日召开委员会,研究具体防疫措施,强调议定预防细菌措施,并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在我的记忆中,墟沟海边一带曾出现大面积的昆虫。我当时正在上小学,在老师的带领

下,我们到墟沟海边捕杀了大量的虫子,这次行动我至今记忆犹新。

保存在临沂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中有不少材料涉及当时新海连市反细菌战的情况。1952年4月15日,在《新海连市反细菌战的防疫工作综合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自4月8日至4月13日,6天中,连云沿海地区,陆续发现大批随海潮漂来的各种带菌昆虫,波及沿海25公里海岸线。各地立即组织力量,共扑灭7次。4月8日,墟沟镇海头湾沿海岸发现大片昆虫。4月10日高公岛柳河乡北海湾等地发现长约20米,宽约1米的带状分布的昆虫。4月11日,墟沟与西墅两地沿海岸发现毒虫。4月12日上午7时许,墟沟沿海岸又发现大量毒虫。这一天,经驻军配合群众约有500人,进行扑灭。记得我当时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班主任于惊涛老师带领我们去海边捕杀害虫。我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破口罩戴在嘴上,跟着队伍向海边走去。一面走,还一面呼喊口号:“消灭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到了海边一看,着实吓了一跳,从海头湾向东望去,一溜海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虫子,有蜘蛛、蚊子、蜜蜂、牛虻、瓢虫、蚂蚁、飞蛾、黑色跳虫等10多种。区委、区政府组织3750名青壮年捕打,计捕打毒虫212公斤。这些虫子绝大部分都是死的。我们先用小树枝夹,有的直接用手捏。将捕杀到的昆虫集中起来,有的埋掉,有的烧掉。

这些毒虫,有的还活着,并带有细菌,传播疾病。据《新海连市反细菌战的防疫工作综合报告》称:自4月1日至4月10日,仅新海连市4

个区发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9 人,死 1 人,伤寒副伤寒 3 人,痢疾 11 人,白喉 3 人,麻疹 64 人,疟疾 28 人,黑热病 2 人。

5 月 13 日,新海连市举办“反细菌战防疫人员训练班”,14 日正式学习。在 8 个区里,总计参加学习的共 63 人,有医生、教师、公安人员、法院干部、银行人员等,编为 8 个小组,每组 8 人。学习时间 5 天,每天 6 个小时。按江苏省防委会规定的中级课程进行。分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学习什么是细菌战,美帝是怎样进行细菌战的,主要是明了细菌战是不可怕的,打破一切麻痹与恐惧思想。第二节是对细菌的一般介绍及传染病概论等。第三节公共卫生,含环境卫生、饮食卫生、水源卫生。第四节布置工作。

自此以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成为开展卫生运动、防疫运动的行动指南,我市卫生防疫工作走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捕杀蝗虫

解放后,我市发生较大的蝗虫灾害有两次,一次是 1951 年,第二次是 1953 年。

1951 年 10 月 10 日,在云台、锦屏两地发生蝗虫灾害。面积约 59000 多亩,内有麦田 11000 多亩,柴地 1800 多亩,余为荒地。蝗虫最密集处每平方米约五六只,少的一两只。小土蚂蚱最密处每平方米约六七只,少者一两只。市委、市政府对灾情十分重视,建立组织,广泛宣传。组织人力进行捕杀。经过 8 天的捕打,到 10 月 30 日上午基本消灭。其间,共动员组织灭蝗群众 26950 人,含新浦民工 4700 人。捕灭蝗虫 6600 斤,小土蚂蚱 5600 斤,共 12200 斤,灭蝗面积 21400 余亩,用药 1500 斤。

第二次蝗灾发生在 1953 年 5 月。在云台、南城、灌云东辛三个地方先后发现 240 万亩荒地、草滩上有大批蝗蝻,其密集度为每平方米百头左右。而南城小海地区最为密集。

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在南城与猴嘴之间的宋觥设帐,成立灭蝗指挥部。由淮阴地区副专员陈凤州任指挥,新海连市副市长季士杰、灌云县县长魏家梅任副指挥,廖佩秀任秘书,坐镇指挥,领导灭蝗。中央农业部对这项工作很重

视,派来了专家郭尔传同志负责灭蝗的技术指导。

灭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飞机撒药灭蝗,一种是组织人力扑打。用飞机撒药灭蝗,这对当时新海连市人民还是头一次,人们十分好奇。国家农业部派来了两架飞机,用去农药百吨,连续战斗一周时间。当时新海连市市长杨祖彤(女),鉴于连云、新浦、海州等地四周草滩很多,是苍蝇、蚊虫滋生地,政府从人民的健康着想,又请求农业部派来灭蝗的飞机能参与灭杀,当时机组同志欣然同意,又作了三次起飞,参与新海连市的灭蝇蚊运动,先后花去人民币一百多万元。当老百姓看到飞机尾部拖着一条长长的白粉带,再俯首看看地上成片的死蝗虫,都感慨万分!不少人发出这样的感慨:“旧社会为我们老百姓造灾,新社会为我们老百姓造福,飞机参加灭蝗,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灭蝗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动员人民群众,进行赶蝗、打蝗。此时,云台、南城、灌云东辛等地,不分男女老幼,出动万人,参与打蝗、赶蝗。笔者当时在墟沟小学读书,三年级往上的学生全部出动,参加了这次打蝗、赶蝗行动。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今开发区西北部一个大草场上,这里有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当我们来到草场时,发现脚下确实有很多小蚂蚱。同学们围成一个个大约直径 100 米左右的大圈子,手里有的拿着大竹扫帚,有的拿着柳树条,有的拿着树枝,一面吆喝着,一面扑打着向圆心赶去。只见脚下的蝗虫、蚂蚱纷纷地跳跃,向圆心集中。同学们的兴致特别高,圈子越缩越小,蝗虫越来越多,同学们扑打的动作也越来越快!劲头越来越足!走过的地方,一片片死去的蝗虫,遍地都是,十分密集。最后,大同学用干草堆起来,把蝗虫烧死。火苗在不断地往上蹿,只听到毕毕剥剥的响声,风里传来一股蝗虫被烧焦的糊味和被烧熟了的香味。

这两次捕虫行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能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参加这样两次有意义的集体行动而感到高兴,并且至今记忆犹新,永难忘怀。

(作者单位:连云区地方志办公室)

曾经的“超声波”

王 贵 林

现今如果人们身体有什么不太舒服去医院里看病,医生会给你开一张B超检查单,就可以把你的肝胆胰肾等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告诉你有病没病十分方便。可是在50年前的1960年它可是一项高科技项目,并像大炼钢铁那样发动全民动手,从工厂到农村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大搞“超声波”的运动。笔者当年正在新海连市(今连云港市)负笈求学正赶上这场运动,谨把自己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叙述如下,以飨读者。

超声波是频率高于20000赫兹不引起听觉的弹性波。由于它的能量容易集中,且强度大,振动剧烈,能引起许多特殊作用。因此利用超声波能进行切削、钻孔、焊接、清洗精密机件,凝聚尘雾,金属探伤、医疗诊断、处理植物种子,还可以测量海深,探索鱼群,自动导航……。

超声波的应用范围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中的工业、农业、渔业、医疗、卫生等范畴,从生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50年前人们对科技的认知水平来看,超声波几乎就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宝贝。因此从北京到各省,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行动起来,也不管懂不懂大家都没见过真正的超声波是什么样子,也不管需要不需要,也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就都一哄而上的去搞什么超声波,其结果必然是一哄而散的结局。

那时笔者是化工部锦屏矿业学校二年级的学生,看到同学们从锦屏磷矿机械厂工人师傅处拿来的所谓“超声波”样品,在感到惊喜的同时,不由得又感到就这么个小管子头的“貌不惊人”,于是就带着同学们也比着葫芦画瓢做了几只,送给老师一看还受到老师的表扬,现在看来老师也是以讹传讹、以误传误,他们也根本不懂“超声波”。就是锯下一段6公分到1吋的铁管子,把一头用钢锯锯个缝,镶进一张比邮票稍大的铁皮,再用锤砸紧(但不砸死),这样一个标准的“超声

波”就做成了。用时通上热蒸汽就可在浴池打热水,在食堂熬稀饭、蒸馒头了。在高温高压的蒸汽压力下,铁片会发生振动并发出“尖叫”声,并把凉水打热,稀饭熬好,馒头蒸熟,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理解“超声波”的。1961年为了比成绩上水平还在新浦举行了誓师大会,笔者还代表学校上台表决心:保证每位师生要做30个“超声波”,向国庆献礼。返校后全校师生都动员起来,把学校实习工厂的大小粗细不等的铁管子都找出来,锯成一段一段的再镶上铁皮,全校集中起来也没做成1000只,实际上这些全都是废品,白白浪费了大量的铁管钢管,(后来为了凑数,连竹管子也被截成一小段一小段),现在时隔50多年,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科学水平已经突飞猛进,人们的科技知识也大大提高,人们都知道A超、B超,除了黑白还有升级换代的彩色B超,那是和一段镶了铁皮的小铁管是八杆子也打不到一起的关系,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东西,至于把浴池打热,稀饭熬好,馒头蒸熟,主要是铁管子通过高温高压的蒸汽,现在人们都明白,镶不镶铁皮的结果是一样的。

一年后毕业实习的时间到了,经联系我们被分配到徐州利国铁矿的磨山变电所实习,发现大搞“超声波”的热潮也泛滥到了这里,这里的食堂和浴池也是用“超声波”打的,但人们已对此半信半疑,有时用有时不用,这股热浪已是强弩之末,等到二个月实习期结束时,工人已开始拆除了,但浴池壁上油漆画痕仍在,仿佛向人们述说曾经的热闹。后来到其他地方实习的同学们说:南京象山硫铁矿,四川金河磷矿还有扬州等地也都搞了“超声波”,但大同小异都走的是一条失败的路,成为中国科技史上沉痛的一页。

(作者通联地址:徐州市七里沟印染厂宿舍1—16)

连云港是日寇犯愁打怵之地

蔡立志

要明白题义，必须弄清楚犯愁打怵的词义。犯愁打怵是一个词意相近的叠加词组，是地道的连云港方言。犯愁一词词意大家都明白；打怵呢，直译较难，打个比方来说吧：就像一个人牙齿不好，见到刚炒出来的蚕豆很香、很想吃，但又怕牙给崩掉了，因此见了炒蚕豆，心里就打怵。犯愁打怵就是这么个意思。另外标题中的日寇指倭寇和日寇两层意思。日寇是指近代日本军政府组织的侵华日军，倭寇是指日本南北战争后形成的浪人、流亡武士及破产农民组成专门侵扰中国大陆沿海的流寇，称为日本倭寇。为了简洁起见，将日寇、倭寇简称为日寇。

中国、日本是东方的两个大国，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一直友好相处。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1 年）徐福东渡日本，成为日本国的医圣、农圣、百工之圣。唐开元五年（717 年）日本人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并起中国名晁衡，学成后在中国朝廷为官，历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职，在中国 36 年，与李白、王维友谊深厚。

天宝十二年（753 年）以唐朝使者身份，随同日本十次遣唐使团返日本，途遇大风，传说被淹死。李白还写了《哭晁卿衡》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为一曲中日人民悠久绵长的友好之歌。唐文宗开成三年（838 年）七月二日日本高僧圆仁来中国学习佛法，探求佛理，从扬州，到海州，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历时 9 年零 2 月，写出了称为日本国国宝的《入唐求法巡礼记》。4 月 8 日到达东海县，县令李夷甫置酒款待，其他官员也来看望，显示了地方人士对日本僧人的热情友好。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夏，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八品巡见官毛朝玉，因海船遇风飘至连云港口鹰游门，知州师亮采“日给稟纡”。毛朝玉为表感恩之情，以“琉球炉”相赠，原存法启寺，现存市博物馆。

从古至今，中日两国一直是友好的邻邦。但在明永乐年代以前，由于两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两国经济贸易不断扩大，双方贸易的主要形式采取日本人贡及明朝政府赏赐的方式在两国之间进行。

1333年以后,日本长期处于南北分裂局面,1392年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国内战争失败的南朝武士流亡在海岛上,成为无业浪人,勾结一些不法商人和部分破产农民,乘船到中国沿海或走私、或抢劫,形成了早期的倭寇。到十五世纪末,足利氏政权名存实亡。日本各地封建藩倭和寺院地主势力,群雄割据,内战不断,为了解决国内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和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便组织或支持日本浪人和不法商人到中国来掠夺物资和财富,甚至官方贡船也假入贡之名进行海盗活动。到明正德、嘉靖年间逐步发展到十分猖獗的程度,不断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入侵,给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到明嘉靖年间,海防形势相当严峻,倭寇侵扰直到江、淮、吴、粤。由于当时明朝集中力量防备北方,沿海武备松弛,给倭寇入侵以可乘之机。有时几个倭寇组成的入侵队伍就可长驱直入,杀人放火,坏事做绝。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倭寇掠苏州,劫芜湖,直犯南京;三十七年(1558年)侵犯扬州,天长、盱眙、泗州,一直打到淮安;三十八年(1559年)入通州,犯淮安,据庙湾(阜宁),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然而,连云港市这块土地,历来令倭寇,甚至近代的日寇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或不至轻易涉足此地。海州地处中国脐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隆庆海州志》论其形势曰:“东滨海道,茫天际汇,高丽、百济、日本诸国直其东,风帆之便,不测可至。”虽然中日一衣带水,交往历史久远,但一直令倭寇乃至日寇视此地心中发毛,犯愁乃至打怵。原因何在呢?可能有两条:一是政府对之设防严密,二是当地勇悍民性使然。

日本南北战争爆发后,日寇形成。明初,朝廷就很注重海州这一海防重镇的经营,有效地遏制着倭寇取道海州对广大中原地区的侵扰。明洪武六年(1373年)海州的海防由淮安卫负责,委官统兵泊舟于东海西石岛(今西墅)守备,配战船十艘。洪武十七年(1384年)南城设守御东海千户所,在东海城十字街东,隶属东海水师营,建有正厅、抢厦、后堂、穿堂、镇抚厅、库房、监房、代厅各3间,东西司库各5间,左右厢房各1间。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设守御海州中

前千户所,在州治北,所建房间数量与东海所相同,其建筑规格和规模与海州州治相当。相对于东海所,称此千户所为西海所,“两所官军专司防倭军事,免其领运。”海州地处海边,为了加强瞭望,设置烟墩,东海所有烟墩18处,西海所有烟墩16处。

为了防御倭寇,加强城池建设,西海所主要加强州治海州城建设。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千户魏玉于海州西城旧址上筑土城。永乐十六年(1418年)千户殷轼砌以砖石、高二丈五尺,周围九里一百三十步,有东西南北四门,月城二,西设水关,池深六尺,东西北门三座吊桥。东海所在明初续建和新建有四座营寨,分别为续建东海城营寨,新建墟沟营寨,宿城营寨和西石岛营寨。东海城旧有大小二城,宋宝右中贾似道献捷所筑,西南两面控海,东北两面抵山,实为重镇。永乐十六年淮安卫指挥周得辛将大城连接小城,东南两面通为一城,增高二尺五寸,并女墙高二丈二尺五寸。城镇二十五座,有东南水关,有东南北门三座吊桥,极为坚固。东海城又称南城。与墟沟营寨相呼应,墟沟营寨又称北城。墟沟营寨为洪武二十六年(1391年)守御千户杨从益开创,正厅三间,后堂三间,左右耳房各一间,东西司房各三间,教场一所,演武厅三间。城池女墙57座,高一丈四尺,面七尺,脚广一丈八尺,周三里九十步,东西南北四门。永乐十六年周得辛又将原城增高三尺,北城规模较小,却非常坚固。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还创宿城营寨,有正厅三间,后堂三间,仪厅一间,教场一所,演武厅三间。西石岛水师营寨的建造情况不见记载,想必是与北城、宿城差不多的坚固壁垒。

据《隆庆海州志》载:西海所配武职:正千户2员,副千户3员,镇抚1员,百户10员。东海所配武职:正千户3员,副千户5员,百户10员。

清顺治四年,改东海所、西海所为海州营,设游击、守备、千总各1员,把总4员,有兵员799名,战马104匹;但因倭寇、海盗侵扰,加之郑成功30万反清复明军队在沿海活动,清政府万般无奈,顺治十八年(1661年)尚书苏纳海会同江南省实行裁海政策,即从海岸线向内陆后撤25公里作为无人区,“订塞海道”“片帆不许

下海,粒米不许越疆”。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廷“复海”。至雍正二年(1722年)漕运总督张大有题复东海营,十年(1732年)设都司。至清嘉庆八年(1804年)海州营额设:游击、守备各1员,千户2员,把总3员,外委千总1员,配马步战守兵员622员;其中步战兵127名,守兵435名,炮兵50名。设有汛地、路墩、烟墩、炮台115处,其中地35处,路墩41座,烟墩34座,炮台5座。东海营额设:都司1员,千总1员,把总2员,外委千总1员,外委把总2员,额外外委2员,配马步、战守兵员452名,内马战兵21名,步战兵48名,守兵347名;另有巡哨战船9艘:有古船2艘,驻防鹰游门内外洋汛,每船派兵22名;有商船3艘,驻防大浦、连岛、西市汛,每船派兵12名;唬船1艘,驻防海头汛,派兵12名;哨船2艘,驻防临洪口、严家港,派兵12名;沙船1艘,驻防高公岛汛,派兵12名。并设有汛地12处、烟墩4处。另有炮台8座:即华岩嘴台,西市、北山嘴、海火、孙家山、上炮台、孙家山下、高公岛,每炮台配炮兵8人。海州营、东海营共有兵员1074名,较清初622人增加了72%。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派提督冯子材率兵来云台,在墟沟一带就明季防倭炮台装配大炮,共装配大炮8尊。同时在孙家山、棺材山、大栋头等处驻海防勇计5营,在墟沟募编民团300名,负责陆地防务,水上防务归外洋水师。

由于历史上的海州海防投以重兵,马、步、战、守兵种齐全,设施严密,坚船利炮攻守皆宜,古代的倭寇视海州这块土地为畏途,他们情愿侵扰淮安、扬州,甚至江南沿海各地,也不轻易窜入海州这块土地。偶尔侵入,也会碰得头破血流。据《赣榆县志》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由夹仓山登岸,掠县东鄙,海州同知章道明,县丞林松率民兵御之。”《淮安府志》载:“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三十六人自海州流入境(沐阳),遇邳州兵而歼。”陈宣《海州志》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突至新疃,州所兵斩获数级,途循去。”这三次发生在海州的抗倭斗争,均以海州军民的胜利结束。又据清《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有倭寇侵犯云台山,海州州官派周淇前往御敌,周淇战

斗勇敢,取得胜利,受到州府奖励,百姓在东陬山西滩为其建“三义祠”。陈宣《海州志》载:“陈升,海州人。征倭,率其徒五人,力战,没于阵。通判范永官祀于东陬山,曰六勇庙。”顾乾《无相上人传》记载:“云台山开山祖师无相禅师捐资修防倭之城(海州城)。”《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载:“隆庆时,州有倭警,筑城,(张)朝瑞请于义,率钱以助之。”《隆庆海州志》还记载:“丁澄,西海所百户,……至苏州府,平倭阵亡。”就是说“海州千户所的百户(官阶)丁澄,为了平倭一直打到苏州,阵亡。这些事迹的出现,与海州人民的个性特征是分不开的。《隋书地理志》载:“考其(海州)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任气节。”明《淮安府志》及《隆庆海州志》亦曰:“海州民俗勇悍,不畏强御,惜名节,保身家。”说明海州人民的个性具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即使到了现代,日本对华侵扰由民间行为变为官方行为,即由倭寇变为日寇,连云港人民仍然敢打敢拼。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日寇军舰就不时在连云港海面上出现,对陆上肆意轰炸,但一直不敢上岸。1938年5月20日晨日寇600多人从孙家山登陆,9时1000多日军从连云港口登陆,至21日黎明被我守军打退,溜下海去。7月8日又从墟沟登陆,遭遇667、668团抵抗,又退回海上。8月2日傍晚,日军占领大桅尖,至下半夜3时,在667、672团两面夹击下,夺路下山,逃到海上,中国军人又取得了大桅尖争夺战的胜利。一直到1939年2月份,日军也未攻进连云港。最后,日寇从日照、徐州、灌河口处三处进攻连云港,才于1939年3月初得以进入连云港。进入连云港后,连云港人民取得了五里槐等多处抗战胜利,连三元宫的僧众也参加抗日战争。日寇最终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滚出中国。由此可见,连云港这块海防重地一直是日寇侵犯中国过程中犯愁打怵的地方。

以上说的是历史,但愿中日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世代友好下去!

(作者单位:市委农工办)

清末垣商李昧辛捐资办学

吴成芳

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区东南一隅的中正,是清乾隆年间(1736年)设立的盐业海州分公司中正场的所在地。在这盐滩上创办的精勤小学,从2009年举办百年校庆以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声名鹊起。

历史曾给中正一段辉煌,古时这里盐商云集,灶户涌入,船民运输,来往不断,常住人口上万之多,缺的是没有学校。清光绪己亥年秋月(1899年),时任海州知州,正堂鲍毓

东深入基层,看到了中正这里兴旺,缺的是教育,他与淮北盐运使司海州分司运判彭家骐和中正场大使陈汝芬等人,决定利用中正街中一所文昌宫的房屋和附近大户骆家祠堂创办第一所学堂,校名取意唐韩愈《进学解》中“业精于勤”,而定名为“精勤书院”。由清代书法家王晓农题写“精勤书院”四个篆体大字石刻,至今仍镶嵌在现在精勤小学的院墙上。

精勤书院的诞生,最令后人缅怀的是那些故去的先辈。清末的中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精勤顺应潮流,由书院改为学堂,后又改为学校。改为学校的第二年,即1912年,由于改朝换代,百事待兴,经费拮据,学校难以维系。当地一大垣商李昧辛,清光绪年间秀才,后又在龙门师范就读卒业。本人学业有成,事业兴旺,他深深懂得“积财千万,无过读

书”的道理。在这艰难时期,李昧辛挺身而出,请缨担当精勤小学校长一职,决心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为了维持学校的生存,他毅然捐献出自己用巨资铺设的四排盐滩,作为学校常年固定财源,从而解决了教师薪俸和办学的困难,改善了办学条件,添置了教学设备。李校长上任后,勤于职守,事必躬亲,周详策划,妥善安排。为学校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他于1912年聘请清末秀才、留学日本、教育世家出身的板浦镇张伦清,到精勤小学执教国文、数学等主要课程,致使学生学业大进,成绩显著,后来该校毕业生多数考入海州第八师范。

当时的中正场乡亲百姓都知道,垣商李昧辛为造福乡里作出了贡献,历史记录了他那段辉煌和荣耀,至今令同仁赞叹不已。在李校长主持下的精勤小学,第二届毕业生中有品学兼优的朱仲琴、陈世德、邱鹤年等人,虽考入第八师范后,因家境贫寒,无力交费,濒于辍学。当时李校长闻知后,慷慨解囊,亲自资助这三位贫困生入学,直至三人师范毕业。后来他们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历史上曾是灌云三才子之一的朱仲琴,民国九年(1920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海属社会面面观》一文,深受李大钊赏识,该文被选入当时全国中等学校国文课本和大专院校国文参考资料。他被誉为“海属泰戈尔”。

目前,这所古老的小学占地47000多平方米,有三幢教学楼,环形标准跑道,学生600多人。环境优雅,布局合理,是市“窗口学校”,省“模范学校”,并被中国教育学会命名为“书法试验学校”。按照现任校长程建勇的说法,精勤小学能有今天,是由于先辈对教育事业的热心,对青少年学子爱护的美德的延续、发扬光大的结果,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特别是李昧辛任职期间作出的出色贡献,在当时中正场上下,有口皆碑。至今还令一代一代后来人称道,是教育界同仁的楷模、榜样。1928年李昧辛辞世后,当地的同仁及职工群众自发捐款树碑。由时任中华职教社负责人的江问渔亲书篆刻碑文“惄然忧之,爰斥巨资……人虽云没,惠胡能忘……用资纪念”。

(作者通联地址:新浦区爱民巷3#1-101)

灌云县小伊乡烈士陵园

本刊编辑部



烈士陵园纪念亭



烈士陵园纪念碑

小伊乡烈士陵园位于伊董公路南侧，北距小伊乡政府约 2.5 公里。陵园占地约 3 亩，内有南北走向花墙分为两院。东院是烈士墓区，内有烈士纪念碑一座，碑文正面镌刻着“坚持董集地区革命死难烈士纪念碑”，背面为 17 名烈士简介。西院有纪念亭，内有纪念碑一座，碑文正面为“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背面为 47 名烈士名录。

1945 年 10 月，国民党独立二师杨步仁部，从县城板浦出发，在流亡队配合下，分数路包围董集区驻地小西庄，董集区中队 30 多名民兵奋起反击，与敌激战一天，打死打伤敌人 40 多名，胜利守住了炮楼。

为纪念这次保卫战的胜利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1963 年清明，中共灌云县委、灌云县人民委员会修建了小伊烈士陵园。1993 年元月，小伊乡党委、政府对陵园进行了扩建，新建了西院的纪念亭、纪念碑等。

小伊乡烈士陵园成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基地。

奇峰独秀在磨山

刘 洪 雨

我对磨山向往已久，主要是想观览奇特的独秀峰，故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等待机会。这一次，机会来了，在与花老的一次聊天中，花老不经意提供的一条信息，促成了磨山之旅。5月20日8时，至浦南8中队门前会齐一同前往的伙伴，挤上草根姐的座驾，直奔东海县城而去。强大的梧桐则由墩尚、黄川一线单骑独往。

不觉间，磨山映入眼帘，但见一尊巨岩突兀



磨山独秀峰

峰顶，花老说，这就是“独秀峰”了。山脚处已见梧桐身影，没想到四个轮子居然没跑过两个轮子。

半坡处清光绪年间禁止采石的摩崖石刻赫然在目，这是这次磨山之行的目标之一。文曰：“盖因石匠劈打诸山名石、破山东江南之气、为此公议，以后大山不许开打，小山名石、山尖亦不许打，如有硬行者，住持报知四乡，呈官理断。住持看守，大清光绪二十年三月上浣公立”。“破山东江南之气”说的有点玄乎，倘若属实，如今云台山常见大片山体被开采的破皮烂爪，甚至有的被拦腰斩断，破的可不仅仅是山东江南之气了。清代先人昭示的环保意识，使磨山这处石刻入选了摩崖石刻拓片巡展，我想更多的是因为它所具有的警示意义。本想给这处石刻做个拓片，但巨石耸立，高不可攀，操作起来多有不便，且时间有限，只得且待下回了。

独秀峰近在眼前，磨山因它而生姿。磨山又称末山，《光绪赣榆县志》说的清楚：“又西南末山，去治七十里，或曰西北之山至此势尽，故名以末”，“其东南一峰特起，顶如仰盂，岚翠亭亭，时露云上，故又名云磨山，”。磨山海拔百米有余，山上怪石嶙峋，东峰巨岩形态奇巧，一峰独秀，在北侧远望状如僧帽，近观又似一钵盂仰置峰顶，故又称“仰盂峰”。但我左看右看，怎么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呢？看来叫成“莲花峰”也未尝不可吧！

独秀峰还有一奇，即峰顶有庙，据当地老人传言，此庙建于唐代，分前后两殿，前为“巨灵

殿”，后称“三官殿”。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有香火大会，从早晨开始，四方村民扛旗背鼓集于山麓，午时三刻一到，寺内钟鼓齐鸣，乡民随之一齐上山，霎时，鞭炮轰鸣，香雾弥漫。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遗憾的是民国十七年后，一股土匪占据了古寺，伐林毁寺，古寺千年基业损毁殆尽。1944年，当时的海陵县人民政府赶跑了土匪，可独秀峰顶的古寺已经荡然无存了，刻有“海上奇观”的山峰也在炮火中消弭无踪。今天，我们会在独秀峰上看到历史的遗痕吗？

带着期待的心情，沿着石缝间的蹬道攀上峰顶，平坦的崖面毫无古寺的踪影。四方远望，一览无余，西南的羽山清晰可见。旧传俗言“羽山到磨山，毛贼万万千”，今天当然不会看到蠡贼，只能看到绿油油的麦田环绕着高低起伏的丘陵，在飘渺的云雾中若隐若现，如同欣赏一幅浓淡相宜的田野画卷。

一条蜿蜒的山路由独秀峰向西峰延伸，路上不时见到一些粗俗的石刻在扰人眼目，极大地破坏了西峰的奇秀与庄严。西峰的抗日烈士纪念塔高耸入云，序文记载了卫国捐躯烈士们的浴血岁月，撰写者为当时的海陵县长铁秋，老人在1982年携家人重返磨山祭奠先烈，重读序文竟哽咽不已（序文详见文末附）。

序文中杨庆福烈士为抗战老人杨凤岐的长子，八路军某独立团一营营长。1941年9月29日，在东海桃林与日伪军的作战中牺牲。杨凤岐，字岐山。东海县石榴乡东安村人，为人刚直，处事公平，1931年起，先后任乡长、区长。1940年11月5日，在中共抗日统战政策影响下，率300多名武装人员在陇海铁路北东安一带抗击日伪军，9月8日，经一昼夜激战，毙敌伪百余人。战斗中，他的二儿子杨庆禄等6人英勇牺牲。丧子之痛没有击倒老人，杨凤岐老人在宿城鹿场路边的卧崖上刻有八字：人心不死，国必不亡！老人抗日之决心可见一斑。

磨山因独秀峰而秀美，历史留下的印痕使我有不虚此行之感，因还要去观看花老所言的“星象图”岩画，只有匆匆而别，但暗自许愿，磨山，我一定会再来的！

素闻我海陵地带有羽山到末山蠡贼有万千之说，此虽难若真情，但亦可谓此地之混乱也。据苍老者言：我海陵地带向来处于平安岁月不临，烧秋即遭抢掠，但当日之执政握柄者仅稳居官府营房，未曾过问人民之疾苦，尤以敌寇踏入国土后，未曾持久抗战而败退，致使我海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疾苦中，是使敌伪据点林立，匪众蔓而四起。任时皆难，比地皆险，其苦状实难一言以毕（蔽）之，幸甚景有抗日健军如同甘霖来临，正值我渴望之际，我八路军不辞艰难，不惧困苦，挺身进入海境，首驱敌寇匪伪，继建民主基地，迄今已四年有余，曾与敌寇匪伪激战数百次，攻克其据点数千处，我乃得以安适而乐居，但不幸杨庆福等抗日志士未待日寇溃出国土，使我军民共举胜利之杯，竟在与敌搏斗中而长逝矣。凡闻之者莫不憾心，莫不追诉。我海陵党政军民为怀念志士之精神，并继而完成其未尽之革命事业，乃建塔以志不忘。

海陵县长 铁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 立

（作者单位：市汽车公司修理厂）



磨山抗日烈士纪念塔

附：《海陵县抗日烈士纪念塔序》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3—15)

本刊编辑部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余万名党员。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赵紫阳向大会作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共分7个部分:(1)历史性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3)关于经济发展战略;(4)关于经济体制改革;(5)关于政治体制改革;(6)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7)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报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指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报告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继续、丰富和发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精辟的理论阐释。据此,报告分别提出了发展经济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中的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等诸方面的基本方针。此外,报告还规定了6个方面的长远性指导方针。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

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首次采用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由175名中央委员和1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由200人组成的中顾委和69人组成的中纪委。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注:十三届四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作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四人在十三届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的职务)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国5100万党员。

李鹏主持大会开幕式。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报告分为4部分:(1)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2)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3)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外政策;(4)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 14 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89 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30 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08 名。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锦涛、丁关根、尉健行、温家宝、任建新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 年 9 月 12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应到正式代表 2048 人、特邀代表 60 人(出席开幕式的

代表和特邀代表 2074 人),代表全国 5900 多万共产党员。

李鹏主持了大会开幕式。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的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报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还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江泽民主持了大会闭幕式并讲了话。大会批准了江泽民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的决议。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3 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51 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115 名。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胡锦涛、尉健行、丁关根、张万年、罗干、温家宝、曾庆红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